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导 言

毛泽东出生在 1893 年。在毛泽东出生的第二年，开始了中日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泱泱大国被一个日本小国战败，订立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又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此后，各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当然，这也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毛泽东成长的年代，在国际上，是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并已经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国内，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是中国进一步半殖民地化的年代，同时，也正是中国人民寻找革命真理、奋起反抗侵略的年代。1900 年的义和团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911 年的辛亥革命运动，打破了帝国主义勾结清政府妄图永远奴役中国的美梦，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时的毛泽东虽然还在学校上学，但他却毅然弃学投军，以一个列兵的身份，投入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运动也没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把政权交给了窃国大盗袁世凯，没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随后，毛泽东回到学校，一边继续上学，一边开展多方面的革命活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这一年正是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师范学习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给予毛泽东极大影响。“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两次进北京，使他接触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并很快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拯救中国的革命真理，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使命是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创建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极其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使命。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提出的伟大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真正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其二是真正了解中国特殊的国情。谁具备了这样两个条件，谁就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谁就是历史的巨人、人民的救星。毛泽东在不断探求革命真理和革命实践过程中，使自己具备了这样两个条件。只有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具备这样两个条件，也只有毛泽东及其同志们才能担负起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重任。正如恩格斯在分析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时所说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的时代。”

毛泽东的时代，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是一个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更加伟大的时代，因此，它也必然产生比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更加伟大的巨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等，都是这个伟大时代产生的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伟大的巨人。

产生巨人的时代，同时也是产生哲学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有

自己时代的哲学。时代产生巨人，巨人必有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时代巨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伟大时代的哲学。毛泽东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内容之丰富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教科书，但它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毛泽东不仅全面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容，而且把马克思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这么丰富的内容，用中国人民特有的语言概括为四个字——实事求是。

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比较了各种思想、主义，清除了自己头脑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主义，牢固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的统治，并运用在革命实践中，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从失败转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战胜了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各种机会主义错误，使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深入人心，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毛泽东用自己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新阶段——毛泽东哲学阶段。

毛泽东哲学就是实事求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运用实事求是哲学指导中国人民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使一个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走上了独立、繁荣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哲学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哲学。

毛泽东功照千秋，永不磨灭，毛泽东得到中国人民最热烈的爱戴和最高的崇敬。

虽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错误，错误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也是离开了他自己创导的实事求是哲学，除了他自己应负的责任外，主要还是中国这个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当时国际阶级斗争所至。在国际上，由于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给毛泽东造成错觉，以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同国际阶级斗争一样严重，促使他离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轨道，又把工作重心转回到阶级斗争上去；在国内，一是中国社会的农业经济基础并未从根本改变，缺乏民主观念，缺乏法律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没有充分暴露，未被认识清楚，因此，错误是难免的。但是，错误时间之久、错误严重之程度，则不能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责任了。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样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造成的，他的错误也应该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因为有了这个反面经验教训，中国人民更加认识到实事求是哲学的正确，更加坚定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哲学路线，使中国人民从错误中更加成熟起来，更加健康地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人民是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的功绩，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当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前进、取得伟大功绩的时候，人民爱戴他、崇敬他；当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的时候，人民照样爱戴他、

崇敬他；当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人民爱戴他、崇敬他；当毛泽东去世以后，人民还是怀念他、崇敬他！

毛泽东虽然去世了，毛泽东创导的实事求是哲学铭刻在中国人民的脑子里，永远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前进的行动哲学。

我们现在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搞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指导我们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哲学，仍然是实事求是哲学。只有在实事求是哲学的指导下，我们才能有比资本主义快得多的速度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快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毛泽东虽然去世了，毛泽东创导的实事求是哲学永放光芒！

毛泽东哲深思想研究

一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及其历史使命

当古希腊人进入奴隶社会的时候，古文明的中国已经走完了奴隶社会的历程，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大约比西方要早整整四个世纪。但是，当西欧人走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具有伟大文明的中华民族却还在封建社会中蹒跚！中国的封建制度太完备了，以至于要走出它的外壳却是如此之难！

一个时代创造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制度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当一种社会制度能较完全地反映该时代精神的时候，该制度是合理的、先进的，不然，就要被时代所淘汰。时代在不断变迁，而社会制度一旦建立却是相对稳定的，要冲破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制度，必须有超乎一般常人的掌握时代精神的伟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也可以说造就了许多伟人，但这些伟人仍然只是封建制度常规下的伟人，他们并没有超越封建制度的常规，未能把握时代精神的脉搏，因此，他们最多只能充当封建制度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不能担当冲破封建制度的重任。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如蜗牛壳一样，一个坚固的外壳，把内部的生命活动同外部的时代潮流隔绝了开来，不管外部的时代潮流如何汹涌澎湃，而内部却始终如一地按部就班、慢条斯理。只有用强力打破这个外壳，才能撤去这种隔绝，达到内外交流，使生命活动富于时代气息。时代在前进，历史在继续，封建制度的外壳终于要被时代所摧毁了。

当历史进入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时候，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进入了垄断阶段，资产阶级加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资本主义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发展。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资产阶级必然要把眼光转向国外，除了加剧商品输出，同时还大量的资本输出，进而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以资本占领国外市场，然后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列宁指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中国正好符合这些条件。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当然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理想地。

为了保障资本输出的利益，帝国主义者必然要把资本投放地变为自己的殖民地。经济上的掠夺，必然伴之以政治上的奴役与压迫。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不仅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同时把他们的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形成瓜分世界的风潮。地球上无主的土地都被占领完了。但帝国主义决不因此各占各的地盘相安无事，而是仍然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这就要去占领有主的地盘，从而必然会造成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组织获得胜利，战胜同竞争者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直到战胜敌方打算用国家垄断

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未占领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是以实力为依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依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依据。而这些分割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能不能‘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能。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市侩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和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为了争夺殖民地，帝国主义必然要发动战争。所以，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爆发的，每次战争都按当时的实力，各帝国主义相应地瓜分到一定的势力范围，随之也会出现暂时的和平。随着实力的变化，原先势力范围的分配又显得“不公”了，于是又要重新瓜分，这就出现了帝国主义时代和平与战争相互交替的局面，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并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经济落后的中国，历来是各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从 1840 年英帝国主义用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各帝国主义的魔爪都伸向了中国。难以从内部打破的完备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面前，就再也坚固不起来了，终于被打开了大的窟窿缺口，完备的中国封建社会，再也不完备了。落后的封建社会同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较量，无论如何是要吃败仗的，中国逐步地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一步一步地被帝国主义瓜分，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民逐步走向灾难的深渊。

但是，中华民族必竟是伟大的民族。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人民顽强的抵抗，帝国主义的强大，并不能征服中国。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从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给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严重打击。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全国人民的反抗中，国内各阶级的力量不断分化和组合，资产阶级政党不断出现，从 1905 年成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到 1919 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称为中国国民党，先后出现过中华民国联合会、中国共和研究会、以及共和党、民义党、进步党等不计其数，表明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寻找中华民族的出路。1911 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封建势力仍然很强大，于是又出现了 1916 年袁世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 卷第 803—804 页。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 卷第 839—840 页。

凯复辟帝制的闹剧。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各地纷纷掀起讨袁运动，原先的备派地方势力和封建统治下的军阀，借机割据一方，相互混战。武装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帝国主义列强在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以后认识到，他们不能直接统治中国，必须在中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以实现其统治的目的，而中国的封建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也必须找帝国主义作靠山，以壮大自己的力量，这就形成了帝国主义与各地方势力及各军阀的相互勾结，从而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中国人民既要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又要受军阀混战之苦，因此，也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走上反抗的道路。

毛泽东生于 1893 年。毛泽东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是国内军阀混战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时代，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寻求出路的时代，是中国的志士仁人探索救国救民的时代。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进一步激化，整个世界处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之中；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指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已经创立，并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被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而且已经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同时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摆在毛泽东面前，也即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赶跑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束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建立一个独立的繁荣富强的真正人民的民主国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艰巨而又伟大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是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该，而且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才能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基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而说的，中国则是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实际情况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这就意味着，中国无产阶级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时候，就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条，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走出一条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的革命道路。这是一个极其伟大而崇高的任务。1919 年列宁在对东方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讲话时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

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谁理会这一任务，并组织人民为之奋斗、取得胜利，谁就是人民的救星、民族的英雄、历史的巨人。

社会历史为自己提出了任务，同时也必然要造就完成这一任务的领袖。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其二是熟悉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民主革命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批领袖人物，但他们都没有能担当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孙中山是伟大的，但孙中山也没能担当这一历史使命，因为孙中山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已经过时了，行不通了。

李大钊曾经写过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他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可惜的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人物却过早地被反动派杀害了。

陈独秀也曾积极地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陈独秀并没有实现自身的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只是向往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他主张完全彻底的西化，认为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将中国过去的愚昧、迷信、野蛮一扫而光，并为新的现代的世俗的西方式国家奠定基础，至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则是一概否定，一切厌恶，主张彻底抛弃。可见，陈独秀既未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没有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既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坚定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自然不能担当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王明虽然学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掌握过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但王明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全然不了解。所以，王明也不能担当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有它的必然性，同时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任何伟大人物的出现和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毛泽东及其同伴们正是在这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点上被历史所选中并造就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人。也就是说，只有毛泽东及其同伴们被历史造就具备这样两个条件，从而，才能担当起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并非圣人，并非生来就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的伟人。毛泽东能使自己具备这样两个条件，担当起这一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使命，是经过了一个历史过程的，这个过程首先是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和由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的转变。

毛泽东完成这两个转变的时间大约在 1920 年，他说：“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八岁进旧式小学读书，背儒经，毛泽东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如“《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16岁时进入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读了一些自然科学和外国历史、地理书籍，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思想和维新运动，读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和论述1898年维新运动的书籍，特别是读了《世界英杰传》，书中的一个个勇士和开国元勋，激起了毛泽东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1911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这一年，毛泽东进入长沙的一所中学，在那里看到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力报》，知道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还读了黄花岗72烈士的事迹，并积极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专制的斗争，发表了第一次政见，贴在墙上，提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这一方面表明毛泽东在中学时代就极为关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另一方面则表明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认识还是很模糊的，竟然把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同维护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维新运动混同起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要清王朝的统治。为此，毛泽东还在长沙参加了军阀赵恒惕的部队，当了半年列兵。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他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了，于是就在1912年春，从部队退伍，继续求学。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上了半年学，觉得还是以自学为好，因此又退学，每天去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自学。在这自学的半年里，毛泽东看了许多反映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典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穆勒的《名学》、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还研读了俄、美、英、法等国的地理历史，以及一些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这些书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很大。毛泽东后来所讲的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些书中学来的，但这些书又大大开阔了毛泽东的思路，这方面的影响之意义更是无法估量的。

1913—1918年，毛泽东在长沙师范上学。师范这五年，对毛泽东是极为重要的，不仅学得了许多知识，丰富了自己的头脑，而且更主要的是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比如，1915年他当选为校学生会秘书，积极参加组织学生的活动，并建立了“学生自治会”，抵制学校当局的某些无理要求；1917年春，各派军阀在湖南混战，毛泽东率领学生“志愿军”，指挥学生保护了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底—1918年初，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是当时最激进的学生会社之一，其成员有许多后来都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人物。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既得到了组织指挥群众运动的实际锻炼，又同全国许多城市的朋友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对今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直到1918年师范毕业时，毛泽东的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促使毛泽东思想转变的是“五四”运动的推动，以及“五四”运动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西行漫记》第131页。

《西行漫记》第108页。

《西行漫记》第125页。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两次上北京。第一次上北京是“五四”运动前，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从而接触到一些文化名人，并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同时还参加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读了许多书。毛泽东曾回忆说，这时他的脑子里的原有思想，加上新接收进来的各种思想，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在脑子里打架，但是，还是以无政府主义为主导地位。随后，毛泽东又回到长沙，当时湖南省内群情激愤，反对督军张敬尧。“五四”运动的爆发，得到湖南的热烈响应，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进行声援“五四”爱国运动的示威游行，接着又成立了有工商界参加的“湖南各界联合会”。当时毛泽东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在该杂志的第二、三、四期上连续发表了他自己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结果《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同时还取缔了“学生联合会”。然后，毛泽东转到《新湖南》任主编，不久，又被张敬尧查封。看来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无政府抵挡不住张敬尧的政府，这对毛泽东的教训是很大的。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这一次在北京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特别是读了三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有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然后又接受了这些正确理论的起示，毛泽东才战胜了头脑中的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才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同其他各种主义作比较以后，才确立起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而，毛泽东在实现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1920年，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深切赞同蔡和森关于“改造中国和世界”，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组织共产党，经过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从社会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标志。

在这个转变的同时，毛泽东也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在这之前，毛泽东是唯心主义者，这主要是封建主义思想的教育，夸大了帝王将相、精神思想的作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是以哲学唯心主义为基础的，都对当时的毛泽东以很大影响。毛泽东从小跟随母亲信神信佛，只是看书多了，接触的实际多了，才对神佛产生了怀疑，发生了动摇。1917——1918年，毛泽东看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了一篇“心之力”的论文，当时教伦理学的杨昌济老师给他打了100分。毛泽东回忆说：“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伦理学原理》是当时长沙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科书，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对《伦理学原理》一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该书上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象这本书上的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根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发，真使我心向往之了。向往唯物主义是因为唯物主义是同现实生活的实际相一致的，毛泽东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旦接触到了唯物主义理论，即同自己的思想一拍即合了。所以，毛泽东实现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一是吸收了有关书籍中的合理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1920年学习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二是自己实践经验的升华。1920年，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详谈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毛泽东看后

回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这就是说，毛泽东完全接受了唯物史观，确立了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这里所谓“我固无研究”是指没有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集中的专门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确立对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信仰。

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在社会实践中经受了各种思想激烈交锋之后确立起来的，所以，一旦确立之后，就在理论上不可动摇，在实践上一往直前。毛泽东回忆说：“一九二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从此，毛泽东就愈加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无论工作如何繁忙，或即在长征途中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只要能搜集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毛泽东都视为珍宝，都认真阅读。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毛泽东就愈加全面地熟练地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了。

毛泽东生在农村，从小在农村长大，13岁时还参加了三年的农业劳动，普遍接触了农民，熟悉农村生活，深刻感受到了穷苦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对敢于起来反抗政府衙门压迫的农民英雄、农民领袖，毛泽东都表示极大的同情和尊敬。可见，毛泽东从小就同农民和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在读旧小说和故事书的时候，也会想到这书里“为什么没有种田的农民？”而为农民抱不平，立志长大了要为农民写书。

在长沙上学期间，毛泽东利用节假日，以“游学”的方式进行农村考察，了解农村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调查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为了消除农民的贫困和社会的不平等，毛泽东曾设想一种“新社会生活”，设想建立一种农民“新村”，在这种“新村”里，大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彼此平等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这实际就是农民向往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这说明毛泽东真是了解农民、熟悉农民、代表农民，毛泽东同农民血肉相联，哀乐与共。

师范毕业后，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送走一批批同学、朋友出国学习考察，而自己却留下来，为的是要进一步了解中国这个社会。所以，一有机会，毛泽东就深入农村、工厂，了解农民、工人的状况，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探讨改造中国的道路。对此，毛泽东曾解释过，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还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况，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毛泽东不被大潮所裹掖，在任何时候都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走自己的路，自主地选择一条最能适合自己而又最有效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毛泽东立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西行漫记》第131页。

《青年毛泽东》第91—92页。

志要改造中国和世界，而改造世界必须从改造中国做起；要改造中国，必须对中国这个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不然，对自己所要改造的对象为何物都认识不清楚，这种改造是决不会有好效果的。只有对自己所要改造的对象了解清楚，并又掌握了改造的锐利武器，才能达到有效的改造之目的。这个改造中国的锐利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改造中国的锐利武器，而又深刻了解了所要改造的中国社会，因此，只有毛泽东才能完成改造中国社会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毛泽东选集》里的大批文章，都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武器，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所写出来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全的产物。

正是毛泽东既掌握马克思主义，又熟悉中国社会，才能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中国自己的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完成了列宁指出的艰巨而又崇高的历史使命。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总结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了、丰富得多了”。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当然，毛泽东在这里只是说“深刻得多了，丰富得多了”，而不是说已经根深刻、很丰富了，这也就是说，还需要继续深入，不断丰富。为此，毛泽东及时指出当时存在的妨碍我党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实际的缺点，这就是不注意对中国现状和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而只知道死记硬背马克思列宁的字句。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并形象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比作‘矢’与‘的’的关系，“‘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不仅自己最好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最准确地射中了中国革命这个“的”，而且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拿起这根“矢”，去射这个“的”。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敢于并善于走自己的路，这是一种顶天立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邓小平同志曾总结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所以，这里必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3—754页。

《毛泽东选集》第754页。

《毛泽东选集》第75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

须具体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掌握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一是熟悉中国的具体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独立思考”，才能把两者结合，才能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又分两个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从广义上讲，或从它的准备阶段来讲，是从1840年开始的，但从它的严格意义上或它的完全意义上讲，则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到了1919年，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其标志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

由于中国的落后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一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相当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资产阶级在举行民主革命前，经过长期的革命的舆论准备，如文艺复兴运动，宣传人性、人的尊严，宣传民主、自由、平等，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没有这种思想准备，中国人民不是在认识到什么人的主权、人的尊严，以及民主自由等人性所必须具有的理性要求下，而是在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下觉醒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下活不下去了，逼得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起来造反。要生存，就得起来同帝国主义斗、同反动派斗，不然，就甭想活下去。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没有经过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的。到了1919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能力和作用，而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既投身于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又积极投入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在这些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毛泽东开始是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西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为指导革命的理论武器，然后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将各种“主义”作了比较以后，才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等第一批先进人物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运用它来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以后，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同各种“主义”作比较以后，才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毛泽东哲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6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8—1359页。

同上书第1359页

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必须同革命队伍内的各种机会主义作斗争，并战胜各种机会主义，不然，就不可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不可能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作斗争，并战胜各种机会主义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普遍的，但是，中国这个社会和中国这个革命却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它有许多同别的国家不同的特点，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则不是容易的随便的。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而不知道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就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字句，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的条条，不可能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必然犯“左”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中国革命过程中，一再发生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都是那些自以为懂得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人，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而造成的。同样，只强调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拒绝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则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必须克服“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特别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必须坚决地开展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只有战胜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机会主义错误，才能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并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后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毛泽东说：“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又强调：“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指马克思列宁主义——作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不克服各种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没有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就不会有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是指马克思、列宁的具体字句，而主要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立场，观点是唯物的辩证的观点，方法是矛盾分析法或阶级分析法，实际上也就是唯物的辩证的分析方法。毛泽东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5—496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5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31页。

可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要求我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作切实的调查和研究，从而制订出切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这就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凭借这种科学态度所进行的最高的理论性创造。当然，这不完全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一部分最杰出人物的集体创造，毛泽东是这部分最杰出人物的最杰出的代表，他集合了集体的智慧，最有效最准确地总结了群众革命运动的经验，抓住了当时时代的精神并加以升华，从而达到了哲学世界观的高度。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明确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并制订出一整套适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点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指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凝结在《毛泽东选集》以及已经出版或正在出版的毛泽东的主要著作中。为了要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就不能不对毛泽东的主要著作进行具体的分析。

要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即明确革命的力量是什么？革命的敌人是谁？要革谁的命？这正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第一句话所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不明确或搞错了，革命就无法进行，进行了也心然要失败。要明确这一问题，就“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分析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就是运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及其阶层一一作了分析，然后得出合乎逻辑的科学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只有二百万左右，广大地区是农村，主要群众是农民。产业无产阶级之所以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因为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主要是实行对农民的领导。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实现对农民的领导，中国的革命才能胜利发展。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最大问题，这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不了解农民问题，或不解决农民问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国革命。一切看不见农民的力量、轻视农民的观点，都是极端错误的观点，都将必然地葬送中国革命。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还是王明的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78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3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9 页。

“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共同一点，都是没有正确认识农民的力量，都没有解决农民问题，都将农民弃置一边，因此，都感到革命力量的不足，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革命力量，因而，都不能不导致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民有深厚感情，无论是念书时，还是参加革命后，都经常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对中国的农民运动极为关心，《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反映了毛泽东对农民力量的重视和对农民运动的关心。并通过对农民运动的考察，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社会蕴藏着极大的革命力量，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源泉和动力，一旦把它开发出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完全的把握。然而，这必须有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才能洞察这种革命力量，也只有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才能开发这种革命力量，而这一切，又都必须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才能办得到。

什么是哲学？马克思讲，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时代的精神是什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这种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怕任何流血牺牲，坚决要冲破反动势力的压迫和束缚的农民运动，是当时时代的大潮所向，是坚决要革命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在这样一种时代精神面前，一切违背这种时代精神的人和力量，都将被时代大潮所淹没，一切感受到这种时代精神的党派和同志，必然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并支持农民运动，到农民中间去，成为农民的朋友，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同农民一块向胜利的大道上奔跑。毛泽东正是把握了这种时代精神，坚决站在农民运动一边，为农民运动欢呼，支持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运动，并从中提炼出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把握了时代的精神，才能创造出时代的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升华。毛泽东正是有了这种哲学世界观，才能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才能使中国革命不断地转危为安，不断走向胜利。

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革命领导权和主力军问题的同时，也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就是井冈山道路。井冈山道路，就是在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确定，正是毛泽东及其同志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点的伟大创举。收集在《毛泽东选集》里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一方面，我们可看到，井冈山道路的确立，是战胜了当时各种错误思想以后的产物，另一方面，更使我们看到，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具有多么丰富熟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怪现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2—13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8 页。

只有在中国社会这种特殊条件下才能存在和发展。中国社会的特点：既不是发达的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又不是落后的完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是一个受“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因为是帝国主义的间接统治，而且又不是一个帝国主义，所以，各帝国主义就要在中国寻找它的代理人，扶持一方军阀，作为自己统治的工具，同时还要划分一定势力范围，这就形成了各势力范围和各军阀之间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和军阀各居一方，互相争斗，造成各派势力都涉及不到的一些中间地带，革命力量就可以在这样一些空间地带生存并发展起来。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亦即“地方的农业经济”，农村完全可以离开城市，小块红色区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割据的地盘，生产、筹集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不但能使自己生存下去，而且还能使自己发展壮大，使自己的地盘不断扩大，由一块到数块，由数块连成一片，然后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态势，继而夺取城市，获得全国的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党的正确领导。

《井冈山的斗争》主要是讲根据地的建设，指明建设好根据地的标准，以及如何建设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下而存在，是因为客观上中国社会提供了这种存在的条件。但是，光有客观条件是不行的。光有客观条件，只是为红色政权提供存在的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转变成现实，还必须善于正确认识和运用这些客观条件的主观努力。没有这种正确的主观努力，可能性永远是可能性，可能性就不会变成现实。因此，“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不具备这些条件，或不去努力创造这些条件，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就不可能。这里特别强调，在一定客观条件下，主观上的努力是极为重要的。主观要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做到主观上不犯错误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能够做到主观上下犯错误，即使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或者在敌人的力量几倍于我的力量的情况下，也能粉碎敌人的攻势取得战斗的胜利，保证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反之，一是主观指挥上犯了错误，好的革命形势就会丧失，革命根据地就会遭到破坏。

在革命队伍中，有人还是看不到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不愿深入农村进行创造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因而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革命力量，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产生了疑虑，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为此，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坚决有力地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不仅处处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而且处处是哲学语言，比如，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高潮的到来时指出“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又如，针对有些人只看到反动势力的强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这一点时指出：看问题“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9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9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6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96 页。

要通过现象看本质，切不可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发展悲观论调。的确，“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所迷惑。”“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那么，如何科学地分析客观情况的实质呢？这就是运用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出决定”。于是，毛泽东就进行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本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就迫使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的激化，因此，中国各派反动势力之间、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必然激化，军阀混战就愈加严重，随之而来的，是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人民与反动政府、反动统治者的矛盾等等都必然地进一步地激化，“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很快会要到来。”这些矛盾就是铺在中国大地上的“干柴”，“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面对着这么尖锐的阶级矛盾，面对着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大好形势，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视而不见，感受不到呢？这就不能不从这些人的世界观上找原因了。为此，毛泽东于1930年，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指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根子就在于“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他们不向社会作调查，不按实际情况办事，而是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单纯的“本本主义”和“上级观念”，一味地盲目地执行本本上所写的和上级的指示，这就不能不“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要洗刷这种唯心主义精神，就必须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中国革命是中国社会这个特殊环境下进行的，中国社会具有许多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特点，这在马克思、列宁的本本里是没有的。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所写的东西，都是马克思、列宁根据各自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实际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所谓“先哲”的神秘念头，树立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总结以往革命的经验，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6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7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7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7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8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8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0页。

《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6页。

目的是清除唯心主义，确立唯物主义。所以，这是一篇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毛泽东不仅自己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分析革命形势，指导革命斗争，而且号召全党同志都要清除唯心主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以利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看问题，就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断地及时地分析客观变化着的形势，随时调整我们的斗争策略，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使革命不断胜利前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当时的形势，为我党制定科学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是建立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便统一全党的思想，更好地贯彻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

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是可能的，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最根本的特点决定的。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促使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态度上的变化，特别也会引起反革命营垒内部的分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下，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即非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削弱了，但它仍然比革命力量强大；另一方面，中国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比过去强大了，但仍然比反革命力量小。一方面，中国的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力量仍然还很强大，中国革命力量发展不平衡，且又还很弱小。在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面前，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把攻击的火力最大限度地集中，亦即“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向着最反动的营垒进攻，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打倒。只有这种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是胜利的策略。

组织好革命队伍，向着主要的敌人进攻，而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战争。因此，就不能不研究战争，学习掌握战争规律。中国革命战争不同于一般革命战争，更不同于一般战争，但是，为了更好地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就必须把中国革命战争放到一般革命战争和一般战争的大背景中去，才能更好地研究。“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情，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部辩证法的专著，只不过它是结合战争来分析的，是一部战争辩证法诗史，生动形象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和一般规律，既是过去革命经验的总结，又是为日后更好地指导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要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就必须对中国革命进行具体分析，认识中国革命同其他任何革命不同之特点，因此，毛泽东一再强调列宁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41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55 页。

的情况”，指出那些“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的人，是“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的，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自称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在于：中国是经过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以及敌强我弱。因为有了第一次大革命，就有了人民群众的基本觉悟，有了革命战争的基础；因为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反革命只能占领或控制经济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对大批小城市必然力不顺心，更不可能控制只能用独轮车和两条腿走路的广大农村及山区，中国共产党就可以在这些敌人力量所不能及的地区发动农民土地革命，组织武装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但是，又因为敌强我弱，则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很快胜利，因为壮大自己，消灭敌人，都需要一定时间，一定过程，性急是不行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战，在战术和战役上是速决战。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由此，产生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如围剿与反围剿、进攻与防御、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等。中国革命战争必须遵循这些规律，离开了这些规律，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进一步表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熟练程度，《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实践论》是认识的辩证法，《矛盾论》是辩证法理论形态的表述。《实践论》、《矛盾论》都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最高表现。毛泽东说过：“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典范，是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批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错误，毛泽东说：“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所谓“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就是唯物辩证的观点。用这种观点考察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必须从中国和日本的实际出发，并如实地把它放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71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71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71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67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14—415 页。

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以此为据，指出“亡国论”是不对的，中国不会亡；“速胜论”也是不对的，中国不会速胜；结论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就要求一切抗日的人们，一方面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则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困难和牺牲是少不了的，但最终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从而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一系列规律。

中国人民的革命是长期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还要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有什么特点，它们的关系怎样？需要给以理论上的系统的说明，以便提高革命人民的理论水平。《新民主主义论》正是分析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毛泽东指出：“旧三民主义，那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基本政纲上是相同的，所以共产党愿意为彻底实现新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有了统一战线的基础。但是，新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又有许多不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宇宙观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这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一次革命论”是错误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也是错误的。从而阐明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在国家和革命的问题上，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的高低、作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胜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的问题。对此不能不认真研究，不能不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延安整风时期的一系列文章，就是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是党的建设的辩证法。加强党的建设，主要是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培养一种好作风。要提高马列主义理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15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53 页。

《毛泽东选集》台订本第 654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50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48—649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49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49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44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46 页。

论水平，首先要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态度，这是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反之，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这是非科学、非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所以，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崇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加快了胜利的步伐。中国人民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中国人民几代人的前仆后继的斗争，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中华儿女！现在终于快要胜利了。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新国家又怎么建设？沿什么道路、朝什么方向前进？这又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新问题，为此，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回答了这些问题。

《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我党走过的28年的历史，提示了阶级、政党、国家发展的规律。“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中国人民的革命是按照毛泽东揭示的规律发展的。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然后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及时地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并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在理论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极大贡献，并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58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70 页。

《毛泽东选集》台订本 770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69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70 页。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含义和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高理论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应该说，任何理论都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但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哲学与其他理论的区别就在于哲学是“最高”的概括和总结，而其他理论都只是“一般”的概括和总结。任何具体理论都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抽象，是以某具体事物为对象的，但哲学并不同具体事物打交道，并不直接对任何一具体事物进行抽象，而是对各种理论抽象的基础上进行的再抽象。所以，哲学抽象是最高的抽象，哲学概括是最高的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区别也就在这里。毛泽东思想的外延是很广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革命思想、文化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党的建设思想等等，都是对某一方面、某一具体领域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对这些理论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各领域的具体理论和实践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依据，反过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又为各具体领域的实践和理论概括提供理论指导。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体系，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都是研究世界的本质及其状况的学说，都是揭示自然、社会、人类思维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同时，组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系列哲学概念、范畴、原理都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相同的，毛泽东没有创立足以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范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概念、范畴、原理在内容上加以丰富和发展，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的时代虽然在发展阶段上很不一样，但作为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过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过时，因此，毛泽东也不需要或不可能创立新的哲学体系去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赋予毛泽东的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运用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毛泽东也正是这样做的。

尽管如此，毛泽东哲学思想仍然有很多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的特点。

第一，从来源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即把他（指黑格尔——作者）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讲的“神秘外壳”，即是指黑格尔为自己创立的

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它的内容是矛盾的，体系是僵死的封闭的，内容则是批判的革命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把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比作建筑物的脚手架，他说：“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助于强制性的结构，这些结构直到现在还引起他的渺小的敌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大厦建好了，“脚手架”就完全可以不要了，大厦有其“骨架”支撑着，但也可以不去管它，人们只是充分享用大厦内的“珍宝”，就可大大得益了，因此，恩格斯接着说：“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终结了的是黑格尔的体系，走出体系的“认识世界的道路”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内容，这就是马克思称之为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继承和发展。

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到费尔巴哈就宣告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黑格尔经费尔巴哈，实现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恩格斯说费尔巴哈“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并且还说：“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影响为什么大？大在什么地方？由于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一些青年黑格尔派要返回到唯物主义去，但怎么也冲不破黑格尔创立的坚固体系，只好在这个矛盾中徬徨，“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更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然而，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所以，恩格斯接着说：“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7—20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8—219页。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扬弃”了黑格尔，而且也同样“扬弃”了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虽然“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完全否定了黑格尔，必然要把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也给否定了。这样，缺乏辩证法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就不能不具有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马克思、恩格斯必须克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这些缺点，使之为辩证法在新的科学基础上的有机结合，这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除了直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同时还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也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从1920年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既是篇政治学著作，又是篇哲学著作，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马、恩的政治学著作、经济学著作、社会学著作等等都充满了哲学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各个领域的具体运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著作，同时也学习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不妨引用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里，回答俄国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关于“马克思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责难时所说的一长段话，列宁在简要地分析了《资本论》以后说：“现在还有人读了‘资本论’而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这岂不是最可笑不过的奇闻么！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评也是在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

“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解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所提出的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批评是从唯物主义原理出发的，看不出这本书的作者本人关于应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切指示都是援引生产关系的。

“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那里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种（而且是最复杂的一种）社会形态的模范，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模范。于是他坐下来拼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从以上列宁的话可以知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一定是从某篇哲学专著中去学，而从马克思的各部著作中都可以学到。毛泽东一接触到马克思的书，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毛泽东正是在研读马克思的各部著作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来，毛泽东还着重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于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有了更加全面系统的了解，并能自觉地运用了。

至于中国的古代哲学，毛泽东同样也有深刻的研究。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中国人民的哲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毛泽东又特别喜欢古代史书和小说，史书方面有《二十四史》、《贤治通鉴》系列及各朝纪事本末系列等等；小说有《东周列国志》、《金瓶梅》、《红楼梦》、《西

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各代笔记体小说、随笔等等。在诗词方面，从《诗经》开始，历代的诗词曲赋都广泛地阅读，并特别喜欢《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等都是毛泽东爱看的。中国古代这些史书和小说都充满了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思想，而毛泽东又特别善于继承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时，用“实事求是”这个词把丰富的辩证唯物论思想表达了出来，而“实事求是”这个词就是从中国历史上继承过来的，这可以在《汉书》上见到。班固在写“汉书”时，为西汉刘景帝的儿子刘德写了一篇“河间献王传”，颂扬刘德治学的认真态度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唐朝大学者颜师古又为“实事求是”作了驻解，说实事求是就是“务得事实，每求真也是”。毛泽东则更进一步，几乎是逐字进行了解释，并给以充分的发挥，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意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变化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毛泽东真是把唯物主义哲学用活了。

毛泽东在讲辩证法时，既从正面深刻阐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又从反面批判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他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这两种宇宙观在中国古代就有，毛泽东在批判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宇宙观时，引用了孔子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人物董仲舒的话：“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下变，道亦不变”，毛泽东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辩证法的宇宙观则要求人们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事物的内部，从联系、发展的观点，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分析事物各方面的特点，反对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在毛泽东的著作里经常引用中国历史上既坚持辩证法，又反对形而上学的故事，在“矛盾论”里讲矛盾的特殊性时，就指出“不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

接着他举了中国历史上因片面性而犯的错误的故事，因坚持辩证法的全面观点而取得胜利的故事，他说：“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759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75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76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87—288 页。

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所以，毛泽东教导人们要学会分析的态度，要有两点论，而不要一点论，他说，“有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可见；毛泽东的辩证法是很受中国古代辩证法影响的，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又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带有中国自身的特点。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正是继承了这份珍贵的遗产，并使之融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

第二，从内容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的最高总结，从实践中来，又指导实践，具有特别强的实践性。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同西方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一样的，毛泽东说：“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革命的敌人特别强大，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且是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它们对待革命人民特别凶狠、特别残忍。在这样的全付武装的敌人面前，中国人民也必须武装起来，毛泽东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并不认识中国的特点，也未认识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得到了惨痛的教训，才开始认识到组织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才开始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288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499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507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508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508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509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511页。

所以，中国的革命是十分残酷的，随时有流血，随时有牺牲，革命的人民，如果没有不怕死的精神，不拿起武器同敌人拼、不把敌人消灭掉，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由于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又占领各大城市及各中小城市，中国的革命力量就不易在城市立足并发展，只能在敌人力量较弱的农村建立自己的立足点，逐步发展壮大，然后逐步夺取城市，最后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因此，中国革命所走的道路是由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力量由小到大一步一步的发展，反革命力量由大到小一步一步地削弱，直至最后消灭。再加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交织在一起，这就使中国革命不仅是残酷的，而且同时又是复杂的、长期的、曲折的，人民胜利的取得，不是靠一次两次战争的胜利，而是长期反复多次的较量，其中有顺利、有挫折，有前进、有后退，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具体战争的失败也是在所难免，因此，胜利的取得是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是极大的代价。革命的人民，特别是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如果不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就不能在失败和挫折面前看到胜利的曙光，树立起必胜的信心，就会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正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世界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懂得革命道路的曲折性，看清敌人的强大只是表面的现象，其本质是虚弱的，是必定要失败的。因此，就能在任何强大的敌人面前、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看到光明的前途，都有坚定的必胜的信心，从而前仆后继，去夺取最后的胜利。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如此高瞻远瞩，如此坚信不移，如此压倒一切敌人的强大气势，这只能是牢牢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才有可能！

政治、经济战线上如此，思想文化战线上也是如此。毛泽东说：“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又有半封建文化，……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这个斗争，在“五四”运动以前，是属于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中国的“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整个革命战争的一部分，是紧密配合武装斗争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573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141—1142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655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658 页。

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由于中国社会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文化战线的斗争同样也是很残酷的，“文”的斗争，同样离不开“武”，没有“武”就没有“文”，搞“文”的也必须要有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具有永不屈服的硬骨头精神，所以毛泽东赞扬鲁迅先生，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可见，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不管是军事战线、文化战线及其他各条战线，都是异常激烈、异常残酷的，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别的国家的最大特点。

中国革命的特点，必然产生中国革命独特的经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就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内容来说，就不能不具有自身的特点。毛泽东哲学思想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辩证法，也就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辩证法特别丰富。毛泽东专门写了《矛盾论》，对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毛泽东还专门写了《实践论》。《实践论》是认识的辩证法。同时，毛泽东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军事、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各条战线，都充分地深刻地发挥了他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生龙活虎的具有最大战斗力的毛泽东的辩证法阶段。这是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复杂性、艰巨性、残酷性、曲折性分不开的，也同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灾难深重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所具有的特别顽强的反抗精神紧密相联的，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富有战斗性。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种批判性和革命性尤为突出。

第三，从形式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和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但这种继承和发展必须同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毛泽东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这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最好代表。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804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658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218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99—500 页。

毛泽东哲学思想无论从其语言表述，还是在其逻辑结构上都有东方文明的特色。一个抽象难懂的哲学概念，一个深奥莫测的哲学原理，毛泽东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表达，就变成生动形象易于理解的普通道理，为一般老百姓所能接受。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毛泽东只是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一系列中国化、民族化的普通语言，表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个哲学基本原理。在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上，毛泽东用“调查研究”、“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通俗易懂的语言，表明思维与存在是有同一性的，思维是能够正确反映存在的，客观世界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的。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对立的，它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但物质毕竟是最终决定的，且转化要有一定条件，毛泽东说：“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转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备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这种主观的想象中的转化是不需要任何具体条件的，但现实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转化都需要条件。一定条件具备了，事物就能发生转化，条件不具备，转化就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创造条件，工作做好了，条件具备了，中国人民的无权就转变成有权，贫穷就转变为富强，落后就转变成先进，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华民族就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好呢？这就必须处理好主客观的关系问题。在主客观的关系上，不是客观统一到主观上来，而是主观要符合客观，如果不合，就会犯错误。客观变化了，主观要适应客观，主观也要随之变化，“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对主客观关系的这些表述，是如此明白，如此通俗易懂。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民族化，是在中国扎了根的真正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哲学。

第四，从社会作用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每个哲学原理、哲学概念的阐发都是有针对性的，都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的，所以特别能解决实际问题，其社会作用也就特别大。而且，毛泽东把哲学基本原理具体化为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便于革命者所掌握，使哲学真正从书斋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哲学的解放，普及为群众的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一特点，也是由于毛泽东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作用，就必须反对党内的各种错误思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304—305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71 页。

想。毛泽东针对党内历次出现的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从哲学的高度对教条主义进行了分析，指出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世界观根源。毛泽东在讲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时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为了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再三再四地强调“调查研究”，并宣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因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都是唯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因此，“必须洗刷唯心主义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不仅要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我党历史上，教条主义造成的危害更大。只有克服了教条主义，同时又避免了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才能更好地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才能进一步在全党确立，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才能进一步提高，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更大的把握。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种战斗性，是同毛泽东肩负的历史使命分不开的。毛泽东的历史使命是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强调改造世界，强调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认识世界的强大的认识武器，但是，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放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任务，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比作“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更好地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仅要讲明道理，而且还必须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具体化为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样，才能全党同志更好地接受和运用，真正成为手中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85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第 17—21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777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68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778 页。

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以及调查研究、群众路线、解剖麻烦、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等等一整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现在就《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为例，谈两个哲学问题，其一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哲学基本问题；其二是矛盾转化问题。

物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就表现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问题，从而也就必然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结论。这些问题，在哲学教科书里是需要几个章节、大量篇幅才能讲清楚的复杂问题，但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却是自然而然地把这些基本原理变为革命工作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革命工作者认识了这一“中心任务”，就去向群众宣传这一“中心任务”的重要性，讲清必须参加革命战争的各种道理，请群众都来参加革命战争。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不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肯定是不行的，但仅仅靠这种宣传教育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呢？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为什么“当然不能”？毛泽东没有说因为宣传教育毕竟是第二性的，物质才是第一性的、决定作用的，毛泽东却是这样说的：“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这里讲的所有问题，都是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是人民群众切身的物质利益问题。如果只在嘴上讲革命战争如何重要，革命战如何正确，而不去着手解决人民群众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要想群众积极投入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还举了江西的长冈乡和福建的才溪乡两个群众工作做得好的例子。毛泽东把物质的决定作用具体化为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生活问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问题，这种衣、食、住的问题不首先解决，人类就无法生存，“革命战争”就不能进行，人类“历史”也就无法创造。反之，只有首先解决好衣食住、柴米油盐的问题，宣传教育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群众积极性才能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呢？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在这里就这样变成了为广大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22—123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2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24—125 页。

问题，成为行之有效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矛盾的转化问题，是矛盾的同性问题，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抽象复杂的哲学问题。毛泽东却在这里形象地比作“过河”。他说：“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一顿。”工作方法就是使我们从此岸到达彼岸，促使矛盾转化的桥或船。

一切革命工作都是转化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转化成当家作主的主人；使人民群众的的生活，从吃不饱、穿不暖转化为吃饱穿暖、生活得好；使老百姓转化为军人；以及从对革命战争认识不高转化成认识很高，从对革命工作没有积极性转化成有极大的积极性，从消极被动转化成积极主动，努力去发展生产，积极的参加军队等等，都要求革命工作者有一整套艰苦细致、切合实际的工作方法。没有科学的工作方法，亦即没有“桥”或“船”，过河就不可能，一切转化也办不到。奴隶变不成主人，老百姓也成不了军人。革命队伍就不能壮大，革命战争就不能胜利。

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任务的完成，就必须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及可能具体操作的方法。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就成了我们完成以上任务的方法。当然，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又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具体任务，如何搞好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并充分发挥外资的作用，这又必须有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单就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说，我们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水平。要完成这一任务，也必须有一套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方法。“小康”是要靠群众自身奋斗去得来的，而不是坐在那里不动，等待什么人的恩施。作为领导者，不是把“小康”恩施给各位群众，这是办不到的，而是发动群众自己去奋斗。领导者的责任是要为群众解决奔“小康”的“桥”或“船”，也就是说，要给予“群众”奔向“小康”的方法。

或者从当前对于国营大中型企业来说，他们的任务是如何扭亏为盈，充分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就要有一套科学的方法。没有一套正确的工作方法，天天在喊扭亏为盈，喊它一百年，“亏”的还是变不了“盈”，社会、经济效益依旧一样差。与其在空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倒不如深入下去，研究出一套可行的办法来。

任何科学的工作方法，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有任何科学的工作方法。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体系，所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叙述也分四大部分进行。

（一）毛泽东的唯物论思想。

1. 物质决定意识。

在物质与意识关系的问题上，机械唯物主义只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意识对物质所具有的能动的反作用；唯心主义正是抓住了旧唯物主义这一缺陷，片面地夸大了意识的能动性，否定了物质的决定作用，走向另一个极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从表面上看，认识——一方面是认识者的人，另一方面是被认识者的对象，认识者的人反映被认识者的对象，是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二者之间的“直观”的关系，当中不隔着任何东西，这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所以，认识是一种“直观”的反映。这是因为旧唯物论，把认识者的人，只理解为生物学上的人，正如动物一样，这是的环境适应它的生活，它就在这里生活下去；这里的环境不适合它的生活，它就走，它就去寻找一个适应它生活的环境，没有任务主观能动性，只能消极地适应环境，不能主动地改造环境，人完全是由客观环境决定的，人在客观环境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人不仅为环境所决定。同时，人也能改造环境、创造环境，这就是通过人的主观的活动，使客观环境变得更加适应人的需要，更好地为人服务，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所以，认识者的人与被认识者的对象之间不是简单的“直观”的关系，而是在中间参与了实践。认识者的人是通过实践的活动，既改变了被认识者的对象，又获得了对对象的认识，同时，也改造了认识者自身，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活动，人正是通过这种活动，获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唯心主义者抓住旧唯物主义者的缺点，并加以抽象地发展，完全否定了客观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把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无限制地夸大，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不受客观环境的任何限制，人可以任意改造客观环境，直至创造客观一切事物，不是客观事物、客观对象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人的感觉、意识，而是人的感觉、意识创造客观事物、客观对象。这就走向了旧唯物论的反面——走向了唯心主义。但是，唯心主义只是把理性活动，才当作实践活动，不是把实践看作感性的物质的活动。所以，还是不了解实践，这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仍然“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的优秀成果，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批判了唯心主义的错误，既肯定了物质的决定作用，又强调了意识对物质的能动的反作用，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毛泽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鲜明地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立场，而且特别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地强调了意识对物质的能动的反作用，即实践的能动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离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实践，就谈不上意识的能动的反作用。旧唯物主义“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所以，“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的直观”；辩证唯物主义把人放到社会关系中去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旧唯物论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辩证唯物主义面向未来，为未来而奋斗。毛泽东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为未来而奋斗的唯物主义，特别强调实践，使辩证唯物主义真正成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以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等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毛泽东并不需要在这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上作更多的文章。毛泽东的任务就在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问题。因此，毛泽东的重点不在于阐明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而是强调物质与意识的同一性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这就是物质与意识，或思维与存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在毛泽东这里的具体表现和具体运用。物质决定意识，在这里就是客观实际或客观环境决定人们的思想、感情、意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阶级斗争、民族斗争，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而思想、感情、方针、政策、办法都是由这些客观事实决定，并由这些客观事实派生出来的意识范畴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客观事实，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感性，以及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办法。要使我们的思想、感情、方针、政策、办法符合或适应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相反。毛泽东特别反对那些脱离客观环境，主观地决定工作方针、工作任务的领导者，因为这都要犯错误的，都要给革命工作带来损失。1945年，我党的工作重心还是在农村，所以，我们的思想就要适应农村的环境，毛泽东说：“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的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

违背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碰壁”就很自然的。正如我们现在所处的改革开放的环境、市场经济的环境一样，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政策、办法都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810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809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916页。

适应改革开放的环境，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市场经济是以价值规律为导向的经济，你生产的产品质量比别人高，成本比别人低，你就能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你就能发展起来。我们现在有些人不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上做文章，而是在搞假冒伪劣产品，投机取巧，有的虽然一时发了财，但终究是要惨败的。因为他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当然要被市场经济所淘汰。

唯物论坚持物质决定意识，强调人的思想要符合客观实际，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的运动变化表现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或从“实际情况”出发，就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必须把“客观事实”或“实际情况”放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出发。毛泽东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里讲的“当时当地”，指的就是时间和空间，实际情况是与时间、空间不可分的，离开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情况”也就不是“实际”的了。在一定时间、空间里是“实际”的东西，在另一一定时间、空间里则不一定是“实际”的，因为原来的“实际”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事实”或“实际”不是凝固不变的。从“事实”或“实际”出发，不仅要从现在存在的“事实”、“实际”出发，而且还要从变化了的“事实”或“实际”出发。认识或掌握“客观事实”或“实际情况”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掌握的“客观事实”或“实际情况”，明天则不一定是实际的了，明天的“实际情况”如何，还要再作了解。用今天的“实际情况”去代替明天的实际情况，用这里的“客观事实”去代替那里的客观事实，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都是一定要犯错误的。2. 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哲学用语，本来就只有在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才有绝对的意义。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丹麦哲学家施达克就是根据费尔巴哈“相信人类的进步”，相信“理想的力量”，并有“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图”，就把费尔巴哈说成是唯心主义者。恩格斯批评说：“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末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显然，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哲学概念，不能施于任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

别的内容，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随便乱用。不然，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就会混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线。

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在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十分强调意识的能动的反作用，毛泽东称之为人类特有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即使是最高级的动物，也不具备人的意识，也没有“自觉的能动性”，只能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不能自觉地能动地改造自然。人的意识虽然来源于物质，是由物质派生出来的，是对物质的反映，但人的意识一经产生，就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要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使物质发生某些变化，变化为有利于人们，为人们所用，这是人高于其他任何动物的地方。人的意识的这种能动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认识作用，认识客观存在的事物；二是改造作用，改造客观存在的事物。物质是高度抽象的概念，是一切事物、实物的总和或总称，从而它又要具体化为一定的事物、实物，以一定的事物、实物的形式出现，因而能为人们所认识，也能为人们所改造。人们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运动形式，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本质是在事物内部的，这就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开展一系列的思维活动，才能从事物的外部，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掌握事物的本质，不然，就不可能认识事物。认识事物的目的，是要使事物为我所用，这就要改造事物，去掉其不利于我的方面，充分发挥其有利于我的方面，这就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从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认识，进而改造客观事物的活动，这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整个过程。

但是，人的这种“自觉能动性”是要受到限制的。除了受人主观自身条件的限制外，主要还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是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二是受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限制。当人们还没有发明并生产出望远镜的时候，不用说千里之外，即使是千米之外，人们也是看不清的，人们认识世界的的能力，不能不受这种观察工具的限制；当人们没有发明动力机、工具机的时候，人们要想移山填海、举起千斤之物，那也只是神话中的事，人们改造世界的的能力，也就不能不受这些物质工具的限制。同时，客观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一定的过程，当事物的发展不到一定时候，其本质就不能暴露，于是，人们也就不可能对其有真正的认识，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利用、改造它。客观事物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对其认识也就到什么程度。因此，毛泽东教导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反之，有根据就可以想，有条件就可以做“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这个“客观事实”，就是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提供的客观条件，有了一定的“客观事实”，就有了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4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本第 224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445 页。

思想的依据，也有了行动的条件，不然，思想是空的，行动是要失败的。这就说明，意识的能动性是在物质决定的基础上，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时候指出：“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论就是条件论，一切都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也就从客观存在的条件出发。辩证法也一样，辩证法讲事物的变化、发展，也都是讲条件，条件具备了，事物就变化、发展；条件不具备，事物变化、发展就不可能。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讲当时努力奋斗实行的是三民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在现在不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更好的制度，……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它的条件。”

综上所述，一方面要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并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革命、建设都不可能进行，更谈不上胜利。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要受条件限制的，没有一定条件，主观能动性就发挥不了，离开一定条件谈主观能动性，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3. 意识的反作用，或人的主观能动性到底有多大？

肯定了人具有自觉的能动性，但如果不明确人的自觉能动性，或意识的反作用到底有多大的问题，那么，还有可能从

“能动性”走向唯心主义。

不错，前边已经明确了意识的反作用是在物质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条件的，是受客观物质条件及其规律制约的，但这毕竟还没有完全明确“反作用”，或“能动性”到底有多大的问题。是不是物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决定作用？意识的反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会不会在一定条件也会起到决定作用？

毛泽东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毛泽东在这里明确地讲“主观是决定作用的”。对不对呢？是不是唯物主义的呢？是对的，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完完全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因为毛泽东这里讲的“主观决定作用”是在肯定了客观物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客观上已经具备了变化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变？如何变？主观就是决定的了。如果主观不想变，或者由于主观认识和行动上的错误，就不能达到预期变化之目的。因此，在这个时候，主观的努力，主观认识和行动的正确与否就是决定的了。毛泽东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427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765—766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454—455 页。

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演戏总要有舞台，连最简陋的空间地盘都没有，戏就无法演出。舞台就是演戏的客观物质条件，是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当然，要演戏，光有舞台还不行，还要有演戏的其他基本物质条件。必须的物质条件具备了，戏演不演？演什么戏？演好演坏，则完全是由主观决定的了。战争与演戏更不一样，要认真分析争取胜利的物质条件如何，只要基本的物质条件具备了，能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完全取决于主观努力的情况如何。认识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最好的客观条件，也会造成失败；反之，认识和行动正确了，即使条件差一些，也由于主观的努力，弥补某些客观条件的不足，争取战争的胜利。

战争如此，我们现在搞建设也同样是如此。我们现在的许多国营大中型企业，其经济效益往往没有个体、私营企业好，如果按其客观物质条件来说，肯定国营大中型企业要比个体、私营的企业好，但是，为什么还老是亏损呢？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方针、政策、办法的问题，是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我国目前国营大中型企业就其客观物质条件来说，是具备了高效益的基础的，只要我们的思想、方针、政策正确，办法恰当，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效益就会很快地极大地提高。同样，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能不能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决定的是我们主观的努力，是我们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总之，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很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在客观基本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大到决定的程度。也就是说，只要在本原的问题上，坚持物质决定意识，在其他问题上，根据实际情况，主观、认识也同样在起决定作用。这不仅不是唯心主义，而且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主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

对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有一段话说得最明确也最准确。毛泽东说：“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邓小平同志讲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正是体现了毛泽东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因为生产关系束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革命。革命就是改变旧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不革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66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300—301 页。

命，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但是，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就完全、永远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吗？不一定。可能是基本适应，不可能是完全适应；可能是一定时间内适应，过了一定时间就不适应了。对那些不适应的方面，以及过去适应现在不适应的东西怎么办呢？这就要加以改革。改革就是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和环节，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和环节，使之更好地适应生产力、适应经济基础，从而更好更快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改革，就不能发展生产力。不能高速地发展生产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无从显现。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只有在哲学基本问题里才是绝对的，此外，在其他别的任何问题上都是相对的。把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绝对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哲学基本问题中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绝对性，是指归根到底的角度讲的，也就是说，对于某一具体情况来说，思维、意识、精神可以是决定的，但意识、精神不管如何起决定作用，从其本原来讲，是由物质派生的，归根到底是物质决定的，这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已经明确地解决了，毛泽东主要是具体运用这一基本原理，所以，毛泽东更强调辩证法，更重视意识、精神的能动的反作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某些话，需要把它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同整篇文章的内容联系起来去理解，而不能简单抽取出来、单从字句上去理解，如毛泽东讲过：“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这段话是在我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夕讲的。一方面，我国的民主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在胜利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所以，我们必须坚定胜利的信心，要有不怕任何困难和压倒一切的勇气，冲破反动派设置的任何障碍，争取民主革命的最后的胜利，因为，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已经具备了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只要我们主观上不犯错误，也就是“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我们就能超越民主革命胜利前夕的任何障碍，战胜民主革命胜利前夕的任何困难，而且，我们确实也“超越”了、“战胜”了。毛泽东讲的，障碍”和“困难”，是指争取民主革命最后胜利的障碍和困难，如果我们离开当时的具体情况，把这些话单独拿出来，说我们“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何困难”，那就未必了。对任何困难和障碍都要作具体分析，只有当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我们才能“战胜”和超越，不然是不可能的。还有，毛泽东讲过，“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又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两段话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156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400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401 页。

驳斥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时说的。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说明中国人民的革命，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而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如果说，中国人民由于没有饭吃而起革命的话，那么，这个“没有饭吃”也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正是发动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才取得的，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根据地的人民就是靠“革命加生产”的办法，解决了吃饭问题的，并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驳斥了“人口决定论”的资产阶级的庸俗唯物论的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这些话正是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不怕任何困难，不畏任何凶恶敌人的大无畏精神和勇气，这在当时也是绝对需要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不怕任何强大的敌人，敢于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斗，并打败了它，使中国人民得以真正站起来，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何等的气魄！

但是，这两段话，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正确理解，我们所吃的苦果至今还不能吞下。人的确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人自身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的生产必须有一定的比例，不承认或破坏它们的比例关系，不管人口增长得快也好、慢也好，并不都是件“好事”。我们的确也曾经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但是，我们也并不是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创造奇迹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条件不具备，什么奇迹也创造不出来。一句话，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就能创造“奇迹”，违背唯物论辩证法，就只能是失败。

（二）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唯物论回答的是世界是什么”，辩证法回答的是世界的状况“怎么样”。唯物论是辩证法的基础，离开了唯物论的辩证法是诡辩论，是变戏法，是胡说八道。“文化大革命”搞的所谓辩证法，完全是这套“变戏法”的把戏，今天你是“老革命”，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今天说你是“造反派”，明天即成了“保皇派”。说变就变，随心所欲，什么事实根据也不要，什么条件也不讲，即使搞点什么“事实根据”，也是任意捏造，是从脑子里“变”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客观的，这既违背了唯物论，同时也沾污了辩证法，给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极坏影响，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声誉。

辩证法首先是观点，然后才是方法。辩证法的观点，也就是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分析的观点。因为客观世界本来既是物质的，又是辩证发展的，只要我们如实地反映它，就是唯物辩证的观点，这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和不断变化发展的；事物变化发展的状态，既是不显著的量变状态，又是显著的质变状态；事物变化发展的道路是波浪式的前进运动，或者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而引起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事物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由于事物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这都是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用这种观点去分析事物，就是辩证的分析方法。所以观点和方法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观点，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同这种世界观相对立的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用形而上学世界观看世界，就把世界上的事物都看成是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即使有变化，也是数量上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而不承认有根本性质上的变化，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承认不承认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而在于承认不承认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实际上，形而上学并不是完全不承认事物的变化发展，而在于否认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显然这是一种违背客观事实的反科学的错误观点。

辩证法的宇宙观在古代很早就产生了。但古代的辩证法是朴素的直观的，只是在整体上描述世界发展的轮廓，带有猜测的性质，因为受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给世界以科学的解释。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是同朴素的唯物论相结合的，因为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所以，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了。形而上学同唯物论相结合，成为形而上学唯物论或机械唯物论。到了18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成为唯心的辩证法。到了19世纪中叶，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又被马克思的唯物的辩证法所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和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是科学的世界观。毛泽东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十分丰富。毛泽东不论谈什么问题，诸如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思想问题、文化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等，无一例外地都充分表现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也不是零散的，而是有其自身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以《矛盾论》为代表，以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包括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辩证法的诸对范畴，所组成的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并把它运用到社会生活

各个领域，解决了实践中的各类问题，指导了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之所以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展开对辩证法的论述，从理论上讲，是根据列宁的指示，从实践上来说，是中国革命实际的需要。

毛泽东说：“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可见，毛泽东关于辩证法的一系列论述，确实是根据列宁的指示，继承列宁的事业。因为，列宁在《辩证法的要素》里，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观点后，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里提出了如何展开论述对立统一规律，以及辩证法同认识的关系问题，这些都只是提纲性的，而未加以全面展开论述。毛泽东就是根据列宁的这些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对立统一规律进行全面的论述，发展了辩证法学说。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开头就讲：“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很明显，毛泽东写的《矛盾论》，就是为了通过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面论述，进一步发展辩证法的。所以，毛泽东的每一篇著作都充满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内容的辩证法。

1. 对立统一规律。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已经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这里只是简要地回顾一下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基本内容及其社会作用。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毛泽东在《矛盾论》的开头和结尾都反复强调：“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不难明白，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和表现。所以，还是毛泽东说的，要弄懂对立统一规律，必须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弄懂了，我们才算从根本上懂得了辩证法。当然，重点是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毛泽东在《矛盾论》里展开了充分的论述，这里只作点简要的概括，其基本内容是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两个矛盾基本属性及其关系。因为有同一性和斗争性，才构成矛盾，才构成事物，客观世界才能存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274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31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在，并得以发展。不然，既不可能有事物的存在，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事物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世界。可见，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就没有世界。但是，世界上的事物又是各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也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不同引起的，这又告诉我们，矛盾又有各自的特点，不仅事物不同、过程不同，矛盾也不同，而且，事物发展同一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不同，各个矛盾及矛盾的各个侧面都有自身不同的特点，由此，才构成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等等的各种关系，以及又同一又斗争的矛盾体系，从而使这一事物成其为这一事物，使这一事物得以存在并发展，从而构成彩色缤纷、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构成整个世界的辩证发展运动。所有这些详细内容，都在《矛盾论》中得到精辟论述，其他任何解释都不能代替《矛盾论》，只有认真研读《矛盾论》，才能深入理解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

对立统一规律的作用是和地位分不开的，是由地位和内容决定的。辩证法除了对立统一规律外，还有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诸对范畴。因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所以，它是贯串其他规律和各对范畴的中心线，是理解掌握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也是同形而上学分歧的根本点。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事物内部的矛盾既对立又统一，从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这是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法，也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同时，又是思维发展的辩证法，即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法。

作为认识的辩证法，其一是说，人的认识是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对立统一中发展的，其二是说，人的认识的获得方法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方法。这样，对立统一规律就变成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更加发挥了它的社会作用。

毛泽东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

这就是说，矛盾分析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是对客观事实的分析，离开了客观事实的所谓分析，是主观主义和想当然，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也就是说，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用矛盾分析法进行分析，也必须用矛盾分析法进行分析，都可以把一个“统一”事物分解为“二”，即我们平常说的“一分为二”。对于一个矛盾来说是“一分为二”，而对于一个事物来说，又何止“一分为二”，还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以至“一分为多”。同时，“一分为二”的“二”，又各自再进行“一分为二”。从理论上说，这个“一分为二”可以一直分下去，但在事实上，由于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及其他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不能如期分下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只能分到某一个层次，超越不了社会历史所能提供的条件。而且分法也不一样，这同样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很明显，一点论是不对的。任何一个国家，有好的，有坏的；有长处，有短处；有成绩，有缺点。一个省、一个市，以至一个人都是如此。一个人有了成绩，成了先进，当了英雄，不是什么都好了，一点缺点都没有了，还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3—41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320页。

是有缺点的；反之，一个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不是什么都错了，一点好处都没有了，也还是有对的、有好的方面的。毛泽东不仅强调对事要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而且更加强调对人也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对于一个人可以一分为二，分为成绩与错误，就是对成绩或错误还可以再进行一分为二，“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这又是一种分析。还可以再进行分析，从其他角度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避免片面性，尽可能地获得对人对事的全面认识。

要分析，要两点论，同时要有重点论。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但是，不是没有轻重、主次，二者都一样，都是半斤八两，这也不是辩证法。辩证法的一分为二是有轻有重、有主有次的，不是两方面等同的。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有一方是主要的，另一方是次要的，因此，对事物进行一分为二时，必须明确谁是主要的，谁是次要的，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延安，还是西安。把成绩说成错误，把延安说成西安，或者倒过来，都是错误的。

有重点，就有中心，要把重点和中心统一起来。在由一个矛盾构成的简单事物中，矛盾双方有主有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事物的重点，也是我们工作的中心所在。事物一般是由一个以上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在这许多矛盾中，不仅要分析每一矛盾双方的主次，更要分析这些矛盾中何者为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中心。毛泽东教导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种“领导艺术”来自对事物矛盾的认真分析，要掌握这种领导艺术，就必须运用好矛盾分析的方法。

目前，我们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搞不好，长期亏损，是否同我们一些企业的领导不会运用矛盾分析法，从而没有掌握这种“领导艺术”有关呢？不妨把自己的企业与别的比自己搞得好的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作一个比较分析吧，人、财、物；产、供、销；以及方针政策、经营管理等等方面，那一条优于人家？那一条不如人家？优于人家的是不是充分发挥出作用了？如何进一步发挥其作用？不如人家的如何弥补？如何克服？国家政策是不是对每个企业部一样？如果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好政策为什么只给它而不给我？一项不好的政策我为什么要接受？为什么不能向上反映，争取改变？如此等等，要是逐一进行比较分析了，脑子也就清楚了。怕只怕，一个企业的领导人，缺乏这种“领导艺术”，不会分析，从来也没有认真的分析过，脑子里永远是一笔糊涂帐，身在领导岗位，其实，从来也不知怎么“领导”，这样的企业怎么能搞好呢？

1930年，正当中国革命处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一些人对革命产生了怀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856页。

疑，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回答红旗“能”打得多久或“不能”打得多久，而是说：“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于是，毛泽东就分析了国际国内各种矛盾，从而“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这就使人们打消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树立革命胜利的信心，积极投入革命战争。

要掌握毛泽东实践并提倡的“领导艺术”，就非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可，特别是我们一些领导，现在是非学习不可的时候了。

2，质量互变规律

毛泽东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一，量变质变是矛盾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两种状态。当矛盾的对立双方处在统一状态的时候，这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显示出不显著的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矛盾的对立双方的统一处于破坏、分解的时候，这是事物处于质变状态，显示出显著的急剧变化的面貌。无论是量变，或者还是质变，都是事物内部矛盾对立统一的表现。第二，量变质变的源泉和动力在于矛盾的对立统一。事物为什么变？什么力量促使它变？量变也好，质变也好，都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推动的。矛盾对立的双方，相互对立着，彼此都要战胜对方。为了要战胜对方，必须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不然，就会被对方吃掉。这就推动双方力量的增长，虽然仍然还保持在一个统一体中，但事物发展了。双方力量的变化到一定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一方的力量压倒另一方，因为对立的双方有同一性，矛盾的各方就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使事物显示出显著的质变状态，一事物就变成了他事物。可见，事物内部的矛盾，既对立又统一，既推动事物量的变化，又推动事物由量的变化转向质的变化，以及不断由新的量变到新的质变，以至无穷，使事物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变”或“变化”，应该包括两种意思，即既指质变，也包括量变。一般来说，变化就是转化，是指质变，是事物显著的变动状态，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相反，事物处于相对稳定的量变状态，往往是感受不到的，因此，以为是“不变”的。毛泽东说：“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大，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这里讲的大变小，小变大，指的都是质变。但是，还有一种变化，也是显著的，也是看得见摸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97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98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306—30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89—290 页。

得着，感受得到的，却不是质变。比如，一个房间里一把椅子从东边搬到西边，这台电视机从北边移到南边，或者房间里增加一把椅子，或减少一把椅子，立刻使你感觉得到，但却没有什么性质上的变化。又如一个单位，一个人从这个部门调到那个部门，增加一个人或减少一个人，也是感受得到的，但也不一定有什么性质上的变化。当然，如果这是一个特殊人物，就有可能使这个单位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原来落后的变成先进的，或者反之，从先进的变成落后的，对此，要作具体分析。

事物的变化是量变还是质变，区别不在于显著还是不显著，而是在于超出还是没有超出一定的度。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保持自己性质稳定性的度，只要是在这个度以内的变化，不管怎么变，不管显著还是不显著，都是量变；一旦突破了这个度，就是质变。有许多事物的质变，也不一定给人以显著的感觉，如小孩长大了，年青人变老了，这都是一种质变，如果天天同他在一块，长大成人了，或者老了，能有什么显著愿宽呢？并没有，但又不能不承认该人发生了一定的质变。

要把握好量变、质变及其关系，就要做到“胸中有数”。“‘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量是质的表现，质是量的基础，量是一定质的量，质是一定量的质。没有无量之质，也没有无质之量，质和量是不可分的，质离不开量，量也离不开质。但是，质和量又是不同的，质是一定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的规定性，量是表现事物质的规定性的大小、范围、程度的外在的规定性。事物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在一定范围内，并不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如果事物数量的增加或减少突破事物质的规定性的一定限度，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一事物就变成了他事物，这就是事物的质变。所以，脑子里要有个数量的概念，一项政策、一个规定，群众拥护的多少？反对的多少？既不表示拥护，也不表示反对的又有多少？各占多少百分比。一个单位的群众，先进的有多少，落后的有多少，中间状态的有多少，各占多大的百分比。一个外科大夫，一天主刀几次？一个月以至一年主刀几次？几次成功？几次失败？成功率多大？一堂课，认真听的有多少？不听的有多少？各占多大的百分比。如此等等，都要有正确的统计，都有一定的百分比。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制定一项政策、一个规定、一个单位及一个人是好的、应该肯定的，还是不好的，必须予以否定的。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往往只听说这个单位好，这个人好，这件事好。但好到什么程度？说不出来，这就缺乏数量的概念，没有数量的统计，不掌握一定的百分比。好或坏，这是质的概念，好到什么程度，坏到什么程度，这是量的概念。对于一个事物，首先重要的是分清其质，判定这个事物是什么事物。但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是远远不够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必须深入下去，进一步掌握其量。由质到量，是对该事物认识的深入，要求更高，做起来更难。比如，我们说这朵花是红的，那朵花是白的，这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但是，要进一步搞清红到什么程度，白到什么程度，这就要求有量的概念了，这就难了。事物的量变就是这种程度大小的

变化，达到了一定度，就会引起性质的变化。所以，掌握量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有了明确的数量概念，就比较容易把握“适度原则”。

度是质和量的统一，是事物保持其质的稳定性的量的限度、幅度、范围。既然是限度，就有最高和最低之分，度就是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之间的这么一个幅度，这么一个范围。度不是一个点，而是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即幅度，超出了最低点，或超出了最高点，都是突破了事物的度，该事物就变成了他事物，如果事物的变化在最低点和最高点之间来回摆动，该事物保持其质的稳定性，该事物还是该事物。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度。认清事物的度，对事物的发展和我们的工作都很重要。当一个事物还有其进步性，还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创造条件，使其变化控制在一定的度内；当一事物失去其存在的必然性，它的存在是多余的时候，我们就要创造条件，使其变化突破它的度，促使它变为他事物。

搞生产，发展经济，都要把握好度，太快了不好，太慢了也不好，要保持适度，太快太慢都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只有做到适度，才能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地发展。

人们生活在社会中，要同各种人打交道，要处理各种关系，该热的要热，该冷的要冷；该热的不热，该冷的不冷，都没有掌握好度。对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热，也有不同的冷，该热的热到一定程度，该冷的也要把握一定的度，过头和不达都是不好的。表扬一个人，宣传一件好事，都有一个度，过头了，人家说你吹，起不到积极作用；达不到一定度，人家觉得不过如此，有啥好宣传的，也起不到教育作用。批评一个人、一件事也一样，过了头，造成反感、对抗，失去了团结教育的作用；达不到一定的度，轻描淡写，不痛不痒，也起不了任何帮助教育的作用。唯有做到适度，才能协调各种关系，有利于事物的发展。

掌握适度原则，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就要防止“左”，也要防止右，使我们的政策既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而尽可能地做到适度。这就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就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太“左”或太右，虽然也可能适合一部分人的需要，但毕竟只是极少数人拥护，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什么叫‘左’右倾”？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情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里‘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毛泽东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既有‘左’的偏向，也有右的偏向，毛泽东说：“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的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这些‘左’的偏向，在过去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一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等”。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讲农业合作化时强调，农业合作化运动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在讲到对民族资产阶级应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时则强调，“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就是十个适度原则。那时就讲政府与工厂企业的关系，既要有国家政府的统一领导，又要给工厂企业一定的独立性，“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在利益的分配上，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的这些教导，无论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中都是必须十分注意的，一旦违背了，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由于毛泽东同志既坚持了反‘左’，又坚持了反右的正确方针，使我党的正确路线得以贯彻执行，保证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使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得以基本完成。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违背了自己的正确思想，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直至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动乱，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害。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制订政策，还是执行政策，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必须既反左，又反右，都必须把握好适度原则。毛泽东说：“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中国才有胜利的可能。”什么是“正规”？正规就是适度，既不左，也不右。左右摇摆，朝令夕改，

《毛泽东选集》四卷集第 1192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集第 721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集第 1192—119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0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08—20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集第 27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75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集第 1193 页。

就不“正规”，也不适度。做到“正规”，把握好适度，这是一个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领导者成熟的标志，而且这里要求“全部走上正规”，而不是某一项政策和某一项策略，这是很高的要求，是努力达到的目标。我们现在也只能说基本上或总体上“走上正规”，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能顺利进行，取得很大成绩，我们的社会稳定，我们的人民安居乐业，但在某个具体政策和策略则不一定“走上正规”比如，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奖励的关系，有对时候只强调思想教育，不要一点物质奖励，而在另一些时候，却只讲物质奖励，一点也不要思想教育，这就左右摇摆，没有走上正规。走上正规就是综合二者的关系，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又重视物质奖励。只讲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必要的物质奖励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就易变成空谈，收不到好的效果；只要物质奖励，不要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失掉人们的理想，迷失前进的方向，使人们只顾眼前利益，鼠目寸光，腐朽的东西就会泛滥，同样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掌握好二者统一的度，才能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不仅如此，量变质变规律还要求我们掌握循序渐进的原则。事物的发展就其整个过程来看，又是分许多阶段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根本性质没有变，过程就不会完结，该事物还是该事物。但其过程却显示出不同的阶段。这是因为，一般事物都是由许多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规定该事物性质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而一些非根本矛盾却发生了变化，有的产生了，有的激化了，有的解决了，有的缓和了，使事物的发展显示出阶段性来。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的质变，而整个过程仍处在量变中。从事物的整体，即从空间来看，整体都是由各个局部组成的，作为整体的发展处在量变状态，但作为局部则可能完成质变，先完成某个局部的质变，然后由一个局部到更多个局部，最后造成整体的质变，旧事物被新事物所代替。

不管是过程的阶段性质变也好，不管是整体的局部性质变也好、都是要从量变开始的，都是由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质变。因此，都必须重视平常的量的积累工作。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想一步登天，一口吃个胖子都是不行的。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战争过程中，如何使我之战略劣势转变为战略优势时指出：“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不仅中国的抗日战争如此，“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战争如此，其他工作也一样。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原来设想的也是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以做“自愿互利、逐步过渡”的办法，计划十年至十五年完成。第一步，以自愿互利为原则几户或十几户农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这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仅仅只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萌芽；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还是以自愿互利为原则，组织农民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生产合作社，这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而仅带半社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57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58 页。

会主义性质；第三步，在第二步的基础上，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使农民逐步适应，自然而然，形成习惯；第二，使干部逐步积累经验；第三，不会影响生产，而且还可能增产。可惜，后来的实践并没有按照原来设想的进行。既违反了自愿互利，又违反了逐步过渡的原则。这种主观设想看起来是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但实际上做起来却并不是。第一步，从互助组的组织开始，需要一个巩固、发展的过程，使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迈向第二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而第二步又需要其自身的从建立到巩固、发展的过程，形成生产力的相当发展。每一步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每一步的巩固发展都需要时间，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一定时间。不明确每一步发展所需要的时间，不考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主观地决定由第一步跳向第二步，从第二步急冲冲地飞向第三步，实际上违背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主观上急于求成，客观上脱离实际，违背了生产力的需要，是一种空想，虽然勉强地实现了第三步，但给生产力带来的影响是严重的，这种影响只是由于人为的努力，把它减轻到最低的程度。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低到高，逐步积累，逐步发展的过程。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由各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组成的。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是带有世界性的，各国间的影响，或大或小，或快或慢，总是存在的；毫无影响、绝对孤立是没有的。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生产力发展快一些，走上世界发展的前面，代表世界发展的潮流，这是常有的事，中国也曾经有过；同样，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各种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慢一些，落在整个世界发展的后面，这也是常有的事，中国有过，别的国家也有，中国当前的情况还是如此。但是，生产力发展快，走在世界发展前列的国家，不可能永远快，不可能永远都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反之，生产力发展慢，处在世界生产力发展后边的国家，也不会永远慢，永远落在后边。这是世界生产力发展辩证法本身决定的。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整体来说，各个国家的生产力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局部、一个方面。客观世界矛盾的发展，有时候由于这个国家某项发明创造、某一新技术的运用，使它处在整体发展的前面，而另一些国家、另一局部则处在整体发展的后面，这样组成一个发展的整体，显示出整体发展的态势。这种状况保持到一定时间，组成整体的各个局部在整体中所处的地位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原来处在整体发展前面的，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落到后边；原来处在整体发展后边，或中间状态的国家，由于有先进经验的借鉴，或者某一新技术的运用，就有可能越到整体发展的前边，这时的整体发展就出现另一种态势、另一种面貌。这就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辩证法，是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发展辩证法。如果先进的部分永远先进，落后的部分永远落后，这就没有什么辩证法，既不丰富多彩，也不生动活泼，而是呆板的僵死的可悲世界。生产力总是要发展的。生产力越发展，各国间的影响就越大，越是显示出此起彼伏、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历史的总结：“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发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

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在交往不发达的情况下，发明容易“失传”，生产力也易“毁灭”，所以，社会的发展就得“各领风骚”。

今天，我们的交往是世界性的、发达的，发明能保存下来，生产力也不易被毁灭。既然可以把生产力保存下来，于是，马克思说：“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运用人家的先进东西，改变自己的落后状况，把落后变成先进。但是，学习管学习，学习不能改变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们过去并不注意或者没有重视马克思这句话，曾经想“跳过”，或者曾经想用行政命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结果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受到了惩罚。

马克思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社会历史是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产品经济，这样三个自然发展阶段。我们曾经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企图取消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从自然经济跳过商品经济，一步跨到产品经济，实践证明是不行的，还得回过头来搞商品经济。当然，我们可以“缩短”商品经济阶段，或者“减轻”商品经济带来的“痛苦”，但决不能跳过它。这里，决定作用的是人们对社会生产自身运动规律的认识，以及运用规律的自觉程度。

恩格斯说：“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它就总是……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不认识电和火的时候，电和火完全是一种自然力，人在电和火面前无能为力，电和火带给人们的只是灾难，一旦人们认识了电和火，电和火就能为我所用，造福于人类。同样，当人们不认识社会生产力时，生产力照样在起作用，不过是起了“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人是社会生产力的“奴仆”。这就要求人们如同研究、认识电和火一样，研究、认识生产力，提高对生产力的自觉性，真正成为自然的、生产力的主人。

诚然，主人也并不是好当的。一个人从无知的小孩进入小学，升中学，上大学，甚至获得硕士、博士学位，都是一个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再由新的量变到新的质变的连续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页。

展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某一阶段，知识的量的积累停止了，或量的积累不足以引起新的质变，这个过程也就提前结束了，因而可能升不了中学，或上不了大学，或得不到硕士、博士学位。没有一定的知识，既不会了解电和火的性能，也不会认识生产力的本性，从而照样还是奴仆，照样成不了主人。学习是一个艰苦仔细的知识的量的积累过程，谁怕艰苦，谁不愿付出代价，谁就达不到预期目的。

我们有些人，只愿意质变，却不愿意平常的量的积累工作，正如一个运动员，只想得金牌，当世界冠军，却不愿意平常的刻苦锻炼，不懂得只有当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质的变化。你想当世界冠军吗？只有平时刻苦锻炼，今天咬咬牙坚持锻炼下去，达到一个新的度。明天再咬咬牙，再坚持锻炼下去，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一点一点地积累、一步一步的提高，才能逐步接近或达到世界冠军的水平，才能摘取世界冠军的桂冠。显然，平时的这种量的积累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又是非常枯燥无味的，所以往往不愿做，往往坚持不下来，因而，也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运动员，到头来也不会有“世界冠军”的质变。为此，不妨引用“中国青年报”的两则例子。“中国青年报”1994年3月9日2版一则消息说：“捷克‘飞毛腿’帕沃尔·纳卡斯基从去年6月1日开始，每一天跑完一个马拉松，连续跑了280天不曾中断，从而打破了美国人罗伯特·威斯格尔在1982年10月到1983年6月间创造的270天中每天跑一个马拉松全程的世界纪录”。这是何等的毅力！相比这下，“中国青年报。”在随后的接连几天中报导了我国的“国足”们在云贵高原体能测试的情况，相当一批“国足”，12分钟跑不下3100米，即使跑下来的也不轻松，因此，就有了3月21日的报导：“无论是12分钟跑，还是折返跑测试，几乎每个队测完后都要躺倒一片，休克的、昏厥的、呕吐的、哭爹喊娘的、被人抬出去的……种种皆有之”，于是记者称之为“‘残酷’中的悲哀”。残酷是带引号的。残酷吗？那你别当运动员了，而且还是国家级的运动员呢！如果稍为有一点人家那种“一天一个马拉松，九个月内不停脚”的精神，“残酷”又从何而来呢？悲哀倒是确实的，12分钟跑不下3100米，还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不是悲哀吗？如果12分钟的苦都吃不下，我想中国的足球也只好“悲哀”下去了。

3、否定之否定规律。

事物是由矛盾构成的。矛盾对立的双方，在“否定之否定”规律里就表现为肯定与否定对立的双方。任何事物都是由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构成的。肯定方面是保持事物存在的方面、肯定这一事物是这一事物，而不是其他别的事物。否定方面是促使事物灭亡的方面，使这一事物转化为他物。肯定与否定双方处在同一事物中，构成事物内部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显现出该事物之所以如此的面貌。可见，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

肯定与否定同处在一个事物之中，双方互相依赖、互相包含、互相渗透，又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资本主义的因素；资产阶级中有无产阶级的因素，无产阶级中也有资产阶级的因素；先进中有落后，落后中有先进；顺利中有困难，困难中有顺利；

胜利中有失败，失败中有胜利；成绩中有错误，错误中有成绩：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如此等等，对任何事物都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任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在批评抗日战争的悲观论者时指出：“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我之失败中，包含着胜利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失败转化为胜利：敌之胜利中，包含着失败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胜利转化为失败。反之亦是，就是我之胜利中，也包含着失败的因素，敌之失败中，也包含着胜利的因素。请回顾我们走过的历史。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难道失败是突然到来的吗？难道失败的因素不是早就包含在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之中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历了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结果来了个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难道这个“失败”和“内乱”是突然降临的吗？难道前几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不是早已包含着失败和内乱的因素吗？苏联也一样，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足以同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如今却解体了，难道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偶然的吗？难道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内部不是早包含着失败的因素吗？毫不例外，任何事物都同时包含着相互对立的肯定与否定两个因素，问题在于认识不认识，在于谁主谁次、谁战胜谁的问题。肯定因素是主要的、占统治地位时，该事物还是该事物，如果否定因素战胜肯定因素，该事物就被否定、就变成他事物。这里应该明确，否定因素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前进的因素，如社会主义社会里，共产主义因素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因素，共产主义因素发展起来，战胜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就被共产主义所否定；二是代表腐朽的反动方面的因素，这是一种已被历史所否定，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但它仍然存在着，如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里还有封建主义的因素，这些东西都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因素，如果资本主义因素战胜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社会就被否定，社会主义就倒退到资本主义，这就是旧事物的复辟，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不过，更应该强调“否定之否定”里讲的否定因素，主要是指第一种因素，即是代表发展方向的前进的因素，而不是指第二种因素，即是代表腐朽的反动的因素。但这种腐朽的反动的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战胜进步的革命的因素，因此我们头脑要冷静些，特别是在成绩面前，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作全面分析，既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也不要困难面前丧失信心，正如毛泽东教导的那样：“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是一个关键的真正考验的时刻，看谁能吃得起苦，看谁能坚持得住！当然，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毛泽东说：“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何以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须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岂非和‘保存自己’

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正确点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需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任何胜利的取得都如同战争一样，都要作出一定的牺牲，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矛盾转化所需要的条件，无此条件，矛盾就不能转化，新生的革命力量就不能战胜腐朽的反动力量，事物就不能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强调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自己否定自己，不是外力的作用，比如今天我走在路上，不小心踩死了一只蚂蚁，这只蚂蚁就被否定掉了。这是一种外力的否定，是形而上学的否定，不是辩证法的否定。辩证法的否定是事物内部肯定与否定两个因素相互斗争的结果，否定因素战胜肯定因素旧事物被否定，新事物代替了旧事物，该事物就向前发展了。所以，辩证的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事物是通过否定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的，没有否定就没有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也就没有发展。

事物发展的这种否定，是一种由客观事实出发，不是离出发点越来越远，而是仿佛又回到出发点的自我运动，也就是说，不是一直否定下去，如肯定否定再否定……一直否定下去，一连串的否定，从头见不到尾，黑格尔说，这是一种“恶”的否定，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而不是辩证法的否定。辩证法的否定强调，事物的发展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经过两次否定，形成三个阶段，肯定与否定组成一对矛盾，否定与否定之否定又组成一对矛盾，两对矛盾，三个方面，其中“否定”，既是肯定的对立面，又是否定之否定的对立面，也就是说，肯定与否定之否定都以同一个“否定”为自己的对立面，两者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从肯定出发，经过两次否定，到达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发展周期。否定之否定阶段重复了肯定阶段的某些东西，看起来好象又回到出发点去了，其实不然，这种回复只是一种“仿佛”，并不是旧事物的复归。因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每一次否定都是否定旧事物的本质的腐朽的东西，而把旧事物中积极的东西吸收过来，作为自己发展的条件，使自己更好地发展起来，其结果，新事物不仅带有旧事物的某些东西或者痕迹，看起来好象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而实际是每一次否定都比前一次更高级、更先进。这表明新旧事物不仅有本质的不同，而且又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否定不仅是个发展的环节，同时还是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说：“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为什么是曲折的，而不是笔直的呢？首先事物发展的周期性决定的。事物的发展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完成了发展的一个周期，前一个周期的终点，是后一个周期的起点，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地发展，竖起来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放倒了是波浪式的前进运动，所以，总是要显示出曲折性来。其次是肯定和否定各方力量增长的不平衡性，有时肯定方面的力量增长得快一些，有时否定方面的力量增长得快一些，从而也显示出曲折性来。再次是特殊情况下的倒退现象，即旧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复辟，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毛泽东说：“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

《毛泽东选集》四卷集第 375—376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集第 141 页。

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但是，“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总的历史规律是前进的，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前进性制约着曲折性，因此，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总趋势总是向上的、前进的。毛泽东说：“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意思是说，不是我们不愿意走直路，而是客观事物发展本身就没有什么直路，所以，就必须准备走曲折的路。有了这种思想准备和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是大不一样的。有了这种思想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碰到了困难，出现了挫折，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努力去克服它、战胜它；不然，没有这种思想准备，碰到了一点困难，受到了一点挫折，就惊慌失措，甚至寻死寻活的，这不仅不能更好地前进，而且必然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掌握这条规律，就是要树立起必胜的信心，以百折不挠的勇气，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50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53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061 页。

（三）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

1、认识和实践

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这是旧唯物论的反映论。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认识论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问题，回答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哲学史上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两派。

所有唯物论者都是可知论，因为它肯定地回答了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表明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彻底的唯心论者也是可知论，因为它肯定地回答了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也表明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尽管它回答错了。只有介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哲学派别，它们企图调和唯物论与唯心论；唯物论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它们说，不一定，你无法证明，唯心论说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它们说，不一定，你也无法证明。那么，世界到底什么呢？”它们说，不知道，谁也无法说清，这才叫不可知论。主张世界是不可认识的，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康德。休谟承认人有感觉、有经验或有观念，但这些感觉、观念或经验是怎么来的？休谟说这是无法证明的，因为你要证明感觉、经验、观念是怎么来的，无非还是依靠经验，这怎么能证明呢？所以世界是什么是不可认识的。康德则比休谟前进了一步，康德不同意休谟的观点，认为人的感觉、经验或观念来自“物自体”或叫“自在之物”，但是，这只是“物自体”的表面现象，“物自体”的本质在内部，因此，“物自体”的本质是什么，是不可认识的。显然，不可知论的错误在于把认识的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现象与本质绝对地分裂开来了。

唯物论的可知论与唯心论的可知论是有本质不同的。唯物论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出发，主张人的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所以唯物论都是反映论。唯心论从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基本观点出发，客观事物都是精神的产物，认识也就是精神自己认识自己，实际上也就是取消了认识。所以，唯心论的可知论是一种先验论，即先有经验，然后才产生万事万物，最后，万事万物又被人的经验所认识，兜了一个圈子，自己认识了自己。

虽然唯物论都是反映论，但又有机械的反映论和能动的反映论之别。其区别就在于承认不承认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机械的反映论，即旧唯物论的反映论，不了解实践，也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把认识当作照镜子一样的机械的反映，马克思讲这是一种“直观”的反映，反映者与被反映者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是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当中不插有任何东西；辩证唯物论把实践引入认识论，认为认识不是照镜子一样的“直观”的反映，反映者与被反映者之间、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插入了实践，人的认识是经实践实现的，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能动的反映论主要是能动在实践上，没有实践，就根本谈不上能动。实践是人们改造世界的社会的

物质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科学实验活动、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此外，还有大量的非基本活动，一般地说，凡是把一种理论、思想付诸于行动，就是一种实践活动。教育家按照一定教育理论从事教育教学活动、戏剧家按照一定的戏剧理论进行戏剧表演活动等等，都是一种实践活动，毛泽东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人们通过实践活动，既认识客观世界，又认识人们自身，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自身。人们是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既获得了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又改造了人们自身，使人们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逐步地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同时也是自身的主人。

自然界本来是统一的，因为有了人的实践活动，所以才把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使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就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界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东西，要自然界更好地为人们服务。在这里，人和自然界的联系，既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又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于是，在认识论中，认识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体是统一的，认识的客体和实践的对象是统一的。认识和实践、主体与客体是认识论中的两对基本矛盾，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就是这两对矛盾双方对立又同一的辩证运动。

从人同自然界的联系上讲，人是认识的主体，同时也是实践的主体，自然界则是认识的客体和实践的对象。但是，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具有一定认识和实践能力、并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人，当然，既包括群体的人，也包括个体的人。认识的客体——从广义上讲——认识主体以外的所有东西，包括物质和精神，都是认识的客体，但是，一般他讲，那些同认识和实践毫无关系的东西，暂时还不是认识的客体，只是那些同认识和实践发生一定关系的东西，才是现实的认识客体，所以，在这里，认识的客体和实践的对象，一般是可以统一的。

毛泽东讲：“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这是从战争的敌我双方来讲的。战争的指挥者，要使自己处于主动，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所以，毛泽东接着说：“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然而，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应该说，我们的头脑也是认识的对象。因为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是一种相对性范畴，我们的头脑相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是认识的主体，但相对于别的人（别的头脑）来说则是处在被认识的客体位置上，同样是属于认识的客体，在人们的认识之列。以此类推，任何人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60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65—166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66 页。

或任何人的头脑都处在这样一种双重地位，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作为自身主体的头脑，也应随时随地把它放在自身认识的客体位置上，也就是把自己作为认识的客体，使自己认识自己，这是最难、最不容易做到的。人类作为认识的主体，认识自然界这个客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关于自然界的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能做到上天、下海、入地，表现了一定的自由度，但相比之下，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就肤浅得多了，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就贫乏得很，诸如人的学习、人的记忆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有人发现人的“特异功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人的气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如此等等，清楚吗？都不太清楚。人作为个体，一个人认识别人比较容易，而正确认识自己却难极了。古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为什么“贵”？因为是难！我们有些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客体地位，从来没有想到要认识自己，结果是自己最不认识自己，最缺乏“自知之明”。所谓“知彼知己，不战不殆”，对于作战双方来说是没有错的，对于一个人，要处理好同他人、同社会的关系也是没有错的；但可惜的是：知彼不容易，知己更难。原因是人有主观能动性，这既是好事，又不一定是好事。人具有主客二重性的特点，作为认识的主体，有主观能动性，积极去认识，这是好的，然而一旦作为认识的客体，被人们认识的时候，就有可能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把自己的真相隐藏起来，反而制造假象，进行欺骗，使你上当。这同社会风气有关，社会风气好，一个人不需要隐藏自己的内心世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实反映，表里如一，使你获得正确认识。反之，社会风气不好，人们彼此不说实话，你防我，我骗你，没有什么真实可言，给认识造成极大的困难。许多人，同志之间关系处理不好，或者不知彼，或者不知己。明明是自己的思想、行为不对，却硬以为自己都是正确的；明明别人是好心、好事，总是把别人想得那么坏，这怎么能处理好关系呢？所以，要随时随地把自己当作认识的客体，努力认识自己，使自己有“自知之明”、这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前提，是做好工作、好事情的必要条件。

2、认识的真理性和如何获得真理性认识。

正确的认识即真理。真理就是主观对客观的符合。所以，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客观。主观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这个认识就是正确的，也就是真理。反之，主观没有如实地反映客观，主观与客观不相符合，这个认识就不正确。主观符合客观的程度，就是人们认识正确性的程度。主观在某一点上符合客观，就有某一点真理，一部分符合，就有一部分真理，符合得越多，真理也就越多，完全符合——对一个有限的具体事物来说是可能的，但对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就完全是真理。真理的标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人们获得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即获得了真理。所以，真理是客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客观真理论，反对唯心主义的主观真理论。唯心主义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在真理观上必然否定真理客观性，认为真理是主观的，是对“我”有用，坚持主观真理论。

真理就其内容来讲是客观的，也是绝对的，也就是说，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并不包含错误。但是，真理又是具体的相对的。因为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总是要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从广度讲，宇宙如此广大，物质如此丰富，人们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认识；从深度讲，从微观到宏观，层层叠叠，人们的认识也只能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认识，社会历史提供什么样

的条件，人们的认识就能达到某一部分、某一层级，然而，却超越不了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同时，客观事物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也要随之变化和发展，停止了，认识的主观就要脱离客观，就要犯错误。所以，主观对客观的符合也是历史的具体的，毛泽东说：“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这是真理的具体性的要求。真理总是具体的，总是同一定时间、地点相联系的。

真理的获得或真理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是由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世界上没有抽象真理，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都是在特定场合下，对特定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某一层级、某一过程的认识，都具有相对性，随着一个个具体的相对真理的增加，人们就会不断地逐步地接近对客观世界的更多的更全面的认识，人们的主观也就能更多更好地符合客观，也就有了更多的真理。

真理是主观对客观的符合，那末，如何证明或检验主观是不是同客观符合呢？或者说，用什么东西来检验主观是符合客观、还是不符合客观呢？这就是认识真理性的检验问题。应该清楚，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两码事，不能混淆。真理的标准是客观，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能是别的东西。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真理的本性是主观对客观的符合，检验是不是真理，就是检验主观是不是同客观相符合。用什么东西去检验呢？主观不行，客观也不行，因为要检验的是主客观是否符合，被检验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作为标准，必须找到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能够把主客观沟通起来，能够把主观放到客观上去加以衡量、比较，这样才能看出主观是不是符合客观。这种东两就是实践，也只能是实践，因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才具有这种特点，因此，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强调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也就是肯定其绝对性。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这是唯一的、绝对的。但这并不排除逻辑证明在人们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人们认识的真理性的获得是离不开逻辑证明的。但是，逻辑证明不管怎么重要，它所能解决的只是前提和结论的关系，并未解决结论与客观事实的关系，要解决结论与客观实际的关系，必然回到实践中去，经实践检验才能解决，不然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同时，逻辑证明之所以有用，也是因为逻辑证明所遵循的规律是从实践中来的，并经实践反复证明了是正确的。这就是说，逻辑证明是离不开实践的，最终是要经实践解决的。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22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61 页。

当然，实践是具体的，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总是要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的。这就决定了，实践检验真理也是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实践，对认识的真理性的检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反复多次地进行的，每次的实践检验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因此，也是不确定的。总之，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确定的，又是相对的不确定的，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确定性与不确定的统一。坚持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绝对性、确定性，就是坚持了唯物论；坚持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相对性、不确定性，就是坚持了辩证法。

明确了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后，进而就要解决如何获得真理了。毛泽东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首先要有“感觉”，然后进行正确的“思维”，最后才能获得“论理的认识”。

“感觉”就是获得感性材料，就要深入实际当中去进行调查，详细地占有材料，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

调查就是了解各种事物的现象，各种情况，是一些感性的东西。这些感性材料收集得越多、越全面、越正确无误，就越有利正确认识客观对象。然后，对这些感性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理论思维的过程。只有经过这一过程的研究分析，才能深入事物内部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不然，最多的感性材料，也只是停留在对事物的表面的现象的认识。不过，要达到对事物的本质认识，除了必要的感性材料，还必须懂得思维的正确规律，在对感性材料分析研究过程中，必须符合一定的思想规律，如果违背思维规律，同样得不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的。

从认识的本源讲，要获得正确认识，必须参加社会实践。毛泽东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调查不同于实践。调查是认识的一种手段或途径，是从他人那里，即他人的实践活动中，获得认识材料，是属于认识领域的活动。一般的调查，并不引起对客观事物的任何变化。实践则不同，实践是要引起对象的某些变化的，实践是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然后是生活活动，有了这些活动，才有认识，通过这些活动，迫使事物暴露其本质，才使人们获得认识。毛泽东说：“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62—263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747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747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68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63 页。

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没有实践，就不能有认识。

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成为其人，是从实践开始的，但这时候的人，仍然受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限制，没有多少自由，是自然界的奴隶，不是真正的自由的人。经过不断的一代接一代的实践活动，不断积累了经验，逐步获得了对客观世界的本质的更多更全面的认识，获得了改造客观世界的更多更大的自由。然后，逐步地成为人自己的主人，同时也成为真正的自然界的主人，从而，就有可能进行自由自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这才是一个真正人的世界。实践是人的本质属性，没有实践，就没有人，也不会有人的世界，所以，要获得正确认识，就要参加社会实践，要真正成为人，也必须参加社会实践。毛泽东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就叫实践出真知。

当然，毛泽东同时也讲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他说：“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就是说，人们要想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还得必须学习书本知识，学习间接经验，学习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只有更好地学习前人的经验和知识，才能更好地进行现实的实践。任何人的实践都是非常有限的。实践和认识都是一代接一代继续的，任何一代人或一个人，都是在前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和认识的。任何人不仅有参加当代的现实的实践和认识的任务，同时还有责任接受前人的实践和认识的成果。这样，人类才有进步，社会才有发展，不然，事事都要亲自实践，事事都得从头开始，人类也就只能停留在当初的原始状态。

3、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毛泽东在“实践论”的结尾，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作了最高度、最精辟的概括，揭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人类发展的总规律。

人的认识为什么不是一次完成，而是要不断实践、不断认识，循环往复，无限发展过程呢？这还得从实践和认识本身来理解。

人们认识事物，是指认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在事物内部，不到一定程度，其本质是不能暴露出来的，人们也就不可能认识它。毛泽东说：“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64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64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64 页。

担当此项任务”。这就是说，人们的认识是受到事物发展本身所限制的，客观事物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认识也就到什么程度。人们的认识可以有预见性，但这种预见性，只能预示事物发展的总趋向，或者设想事物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有怎么样的表现，然而，“设想”必竟是设想，至于事物今后的发展是否同“设想”相一致，这不决定于设想，而决定于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设想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来校正。设想是根据事物当前的状况对其未来所作的推测，而不是对未来事物的真实认识，可见，设想不能代替对客观事物的真实认识。

同时，认识还要受到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限制。在一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条件下，人们可以创造一定条件，利用某种技术手段，迫使事物的本质暴露出来，以便人们认识。然而，生产力、科学技术都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也都受制于一定条件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不到一定水平，一定的实践和认识工具就生产不出来，人们的认识也就必然受到了限制。有时候，即使事物的本质暴露在人们面前，由于没有一定的认识工具或认识手段，却仍然不能认识。

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由于实践活动的范围、知识水平、思维方式以及立场、观点等等的关系，都会影响人们的认识。前边提到的，即使事物的本质暴露在你的面前，只是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你也就不能抓住时机，获得对该事物的本质的认识。由此可知，人的认识，从主客观的关系上讲，既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又受主观条件的限制，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总是一个过程接着一个过程，不断深化、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

从空间上看，广袤的宇宙无边无际，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先认识自己周围同自身密切关系的事物，由近及远，扩大开来，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认识。同人最密切、人最关心的是吃穿住，因此，农业首先发展起来了，畜牧业、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然后是数学、天文学发展起来了，最后才是其他各个领域、各门科学的发展，从陆地到海洋，从地面到天空，从地球到宇宙空间，不断实践，不断认识，没有止境，没有完结。

从时间上看，今天是从昨天来的，昨天又从昨天来的，一直往后逆，没有一个起点；今天又要发展到明天，明天又有明天，一直往前追，漫漫历程，没有一个终点。今天的事物是从昨天的事物发展来的，今天的事物还要发展为明天的事物，或者被明天的事物所代替，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今天有的事，明天没有了，今天没有的事明天产生了，今天认识了这一事物，明天又是另一个样了，还得重新认识，事物在不断发展，认识也必须要随之发展。

从实践上看，人们的社会实践也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越来越高级，越来越深入，这是一个逐步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

人类认识发展的这一总规律，揭示了认识是一个充满矛盾运动的复杂过程，从感性到理性，又从理性到实践，都要经过一系列的中介或发展阶段，从而组成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运动，如果把这一认识过程中的某一环节或某一阶段单独地抽取出来，并给以固定化、绝对化，就会使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就会犯形而上学或唯心主义的错误。列宁说过：“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

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可见，仅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人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明确这一点，不是为犯错误辩护，而是要小心谨慎，尽量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则要求尽快改正。

认识运动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但这个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离开一定历史条件，不管超越或落后一定历史条件，同样也都会造成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当着事物发展的某一客观过程尚未结束，人们硬要超越这一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冒险主义、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当着事物发展的某一过程已经结束，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已经向前推移，而认识还停留在原来的阶段上，这就是保守主义、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

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动是通过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运动表现出来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在实践中产生，并通过实践得到解决。所以，认识和实践的矛盾是认识辩证过程中的根本矛盾，不管什么人，一旦脱离了实践，或停止了实践，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运动就会终止，思想就会趋向僵化。这是认识总规律决定了的，不可抗拒的。

实践无止境，认识也无无止境，任何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人类是在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中不断前进的。

（四）毛泽东的唯物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新发现、新创造，是马克思对人类的最伟大贡献。列宁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在这以前，整个人类社会历史领域长期被唯心主义统治着。唯心主义把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原理贯彻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把精神、思想的东西，作为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性的东西。因此，人类社会历史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一切都决定于伟大人物的思想、观念，人类社会历史是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的历史。在这以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也只是在自然领域，在社会历史领域，它们却是一致的——同唯心主义相一致。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社会历史领域活动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定思想，都是按一定思想行事的，如果只看到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而看不到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力量，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创造这种理论的人，一般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他们不能不受本阶级的阶级利益所制约，为本阶级服务。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迫使劳动人民俯首贴耳、唯命而从，千方百计地束缚和麻痹劳动人民的思想，破坏他们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把社会生活神秘化，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了的，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因此，只能服服贴贴地当奴隶。这种思想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受到统治阶级的保护，所以得以长期地占领社会历史领域。

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如同自然界一样，都是合乎规律的，恩格斯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结束了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统治，克服了以往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使唯物主义成为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人类提供了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使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各门学科有可能真正成为科学。

毛泽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分析中国社会历史，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制订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并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唯物史观。

一、经济建设是中心

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 卷第 380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74 页。

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生产和生活都是历史活动，但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有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等，但作为基础的是经济生活，即物质生活，经济的或物质的生活是由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的。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既决定人们的经济生活，又决定社会的其他一切生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到什么水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也就达到什么水平。因此，抓好生产的发展，搞好经济建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要求，毛泽东即便在战争极其紧张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号召全党抓经济工作、发展经济。毛泽东说：“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感到疲惫。……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才能使我们有力去扩大红军，……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满足。”如果不重视经济工作，不去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1941年，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指示边区的工作：“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当革命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革命重心快要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毛泽东又及时发出号召：“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这就是战争与经济，或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流血的政治或不流血的政治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都得靠经济来维持，也都是为了一定的经济利益。离开经济就不可能有什么战争，也不会有战争的胜利。所以，经济是基础，是决定其他一切的东西。只有抓好经济建设，其他各项工作才能更好开展起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经济也好，战争也好，都是群众的事，都要群众参加，都要发动群众。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要发动群众，既要给群众以物质利益，又要给群众以政治教育，毛泽东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05—106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206—1207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7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241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241—1242页。

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中国的最广大群众是农民，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实行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实质上就是实现对于农民的领导，而农民是最讲求实际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结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全国解放以后，党更应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经济，使广大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毛泽东说：“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讲得多么深刻！能不能尽快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起来，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党的领导、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性问题。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疏忽，或者动摇，就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然要吃大亏。我们也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

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以很好贯彻执行，有一段时间，只注重抓意识形态的斗争、搞政治斗争，而没有认真地抓经济建设，忽视人民群众应有的物质利益，不敢讲改善、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结果是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的发展。物极必反，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只讲物质奖励，而放弃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又出了不少问题，当前社会中流行的个人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都是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实践教育了我们，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能不处理好。我们现在实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的，我们必须认真地坚持下去。

二、生产力标准论

从经济是基础的观点出发，进而必然肯定生产力是决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有没有更多的东西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是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只有在充分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既能为该社会提供巩固的物质基础，又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因此，发展生产力应是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这个生产力标准论具有全面性和最终性。

所谓全面性是包括一切的意思。各行各业，不管你从事那一行、那一职、那一业，都要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标准，树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观念。从生产领域来说，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那一个环节都要合理、畅通，才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从生活领域来说，生产出的东西，也要进行交换、分配，然后进入消费者手里进行消费，前者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后者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两大系列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的发展，都应安排好，都应明确树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坚决不做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社会生活复杂得很，有许多事情离生产力比较远，或者很远，不同生产力直接相关，当中要经过许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168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07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97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980 页。

多中间环节才能同生产力联系上，如教育、政治、文化、艺术、宗教等等，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也离生产力较远，所有这些，不管近的也好，远的也好，最终都要同生产力联系上，都要归结到生产力上来，都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象一棵大树一样，不管有多少枝枝杈杈，根子是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其他什么也不可能有。我们平常评论一件事是好还是坏，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尽管有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等的标准，但最根本的还是以生产力为标准，阻碍或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举措，才是真正的坏事，才是真正的反革命。那些盗窃电线电缆，造成工厂企业停产，那些破坏通讯设备，造成大范围的通讯中断，那些贪污、受贿、欺诈造成企事业单位不能正常运转，以至严重影响生产的人和事，应定为反革命罪。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革命与反革命是以阶级斗争来划分的，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也应有所变化，其重心应以政治标准转向经济标准，阶级本来就是经济范畴，突出经济标准，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是阶级及阶级斗争的本义，也是当前工作重心转移的客观要求。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反革命，这是生产力标准论的应有之义，也是应该得出的结论。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提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与工人农民的结合，愿意并实行与工农结合的，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就是反革命的。这是由当时的革命任务决定的，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工人农民的积极参与，革命就不能胜利，所以，一切反对、压迫工人农民的都是反革命。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时也讲到：“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弄死耕牛、烧毁粮食、破坏工厂，都是反革命行为，都作为反革命论处，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把“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也是作为反革命论处。当前我们搞经济建设需要银行积聚大量的资金，我们有些人则抢劫银行，大肆挥霍；我们为了方便群众、美化环境，搞了许多公共设施，而有些人却破坏、盗窃公共设施，等等。当然，从主观上，这些人并不一定反对无产阶级政权，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仇恨，但在客观上，他们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给人民生活造成了困难，难道他们自己不清楚吗？我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凡积极参加经济建设、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就是革命的，反之，就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因为不把经济搞上去，不把生产力发展起来，就没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立足之地，就没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存余地，这同过去战争年代，不把敌人消灭，我们自己就要被敌人消灭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必须对破坏经济建设、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人进行严厉制裁，扫清经济建设、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尽快把我们的经济、生产力搞上去。

生产力是最根本的，是决定其他一切的东西，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国家之间的斗争都是以生产力为基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胜利，破坏生产力发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展的必然失败。把生产力标准与其他标准统一起来，统一到生产力上来，牢固树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观念。

人类一开始就是专门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除了生产还是生产，别的什么也没有，生产活动本身就是人们日常的生活。但后来，由于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发展了，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消费的生活活动，然后，才有其他种种活动。生产愈发展，社会生活也就愈加丰富、复杂，但根本的总是从生产出发的。到现在为止，人类的一切活动，也无非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大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不可分的，认识世界从改造世界开始，又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并在改造世界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改造世界就是生产活动，是生产力的实现过程，是人们最根本的实践活动。不言而喻，认识世界也好，改造世界也好，都要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准则。

所谓最终性，就是“归根到底”的意思。前边讲过，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是实践。实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广义上讲，把一种思想、理论变为行动都是实践活动。按照一定思想、理论进行的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说明这个思想、理论是正确的。这是一种检验，但不是最终的检验。最终的检验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实践检验也具有最终性，两者并不矛盾，因为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其他实践都是由生产实践派生出来的，也都是为了生产实践的。所以，要把其他所有阶实践都归结到生产力上来，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标准。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对于某一个具体斗争来说，革命阶级的胜利和反革命阶级的胜利都是有的。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所采用的特定的斗争形式所进行的斗争，反革命阶级胜利了，这不能不承认它对这特定场合下所进行的斗争的认识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反革命阶级针对这一特定斗争所制定的方针、策略、计划是正确的。但反革命的这种斗争，不管有多少次胜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反革命阶级都要向革命阶级进行疯狂的报复、大肆地屠杀，掠夺人民的生命财产，使生产力遭受严重地破坏。反革命之所以是反革命，不在于它某些具体斗争的胜利还是失败，而是在于它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某一个具体战役或某一件事情的认识可以是正确的，根据这一正确的认识所进行的实践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只是对生产力发展不起促进作用，甚至是破坏作用，那么从总体上或从归根到底来讲都是错误的、失败的。所以，必须把人们的认识真理性的实践标准，最终归结到生产力的高度，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生产力是认识和实践的标准，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及社会制度巩固的基础。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也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动力。我们平常讲，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为什么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呢？因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就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样说来，好象生产力的发展完全是由生产关系推动的。其实不然，生产力自身就有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内部以劳动者的人为一方，和以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构成的物为另一方，构成的矛盾运动，是生产力自身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生产力不需要什么外力来推动。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总是要不断发展的，这是“必须”的根本原因所在。区别只在于发展快些或慢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就快些，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时

候，生产力的发展就慢些，有时候可能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出现倒退，这是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但这也只是暂时的现象，生产力不能不发展。相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这时候，保持生产关系的稳定性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待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显得落后于生产力、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时，就要及时地改变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样又会推动生产力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一对矛盾，构成生产方式。作为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是生产方式变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这里，生产力是内容，生产关系是形式，任何内容都要有一定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要适合内容。因此，在这里，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内力”，而不是什么“外力”。但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关系的变更，又引起上层建筑的变更，这就是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衡量一个生产关系是不是先进、一种社会制度好不好，也只能是以生产力为标准，而不是道德标准或思想标准。凡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就是先进的，反之，就是不好的、落后的。原始社会公有制是好的、先进的、因为它适合原始生产力所需要的，因为那时生产力很低，低到单独一个人不能进行生产，必须许多人结成一起才能进行生产。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只能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群体生活。后来生产力发展了，单独一个人也能进行生产了，而且生产出的东西供自己生活还有剩余。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还归大家公有就不方便了，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了。于是，将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划归个人私有则是必然的，是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这样，私有制就代替了公有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私有制的发展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奴隶制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任意屠杀、买卖，如同对待牲口一样。奴隶制是野蛮的残酷的。但当奴隶制代替原始公有制的时候，它是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它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因此，奴隶制是好的、先进的，奴隶制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显得落后了，不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了，一个新的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封建制就代替了奴隶制。封建制在比奴隶制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制是好的，先进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制又逐步地失去了它的先进性，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新的比封建制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代替了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先进得多、优越得多，所以它能大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总结历史发展时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很显然的，它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创造了比封建制高得多的生产力。

每一种社会制度的出现和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也就是说，都是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并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当它完成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以后，又都必然被历史所淘汰，被更高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所代替，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以往的社会形态相继地走完了自己的历程，被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越性，使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但是，资本主义一方面促进生产高度的社会化，另一方又使生产资料高度的私有化，这样就造成了尖锐的矛盾。在这一对矛盾中，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是决定的方面，而高度私有化的生产关系则是从属的方面，解决这一对矛盾，决不可能降低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去适应私有化的需要，而是相反，只能是改变私有化的生产关系去适应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需要。适应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所需要的只能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正如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必然代替公有制一样，当私有制发展到了最高峰、再也不能适应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需要的时代，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因为在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情况下，同样，任何一个人不能单独使用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必须同其他生产者协同合作才能进行生产，才能生产出某一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还是归个人私有，显然又不方便了，不合适了，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了，只有公有制才能适合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可见，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也是历史的必然。只要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至于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种更高的公有制叫什么，这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以前就有人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也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已经叫了一二百年了，我看就叫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无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出现和存在都有它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曾讲过，封建制的物质基础是“手推磨”，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蒸汽磨”。当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英国建立起来以后，封建势力的复辟和资本主义的反复辟的斗争就激烈地进行着，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其他国家的建立，封建势力的复辟和资本主义的反复辟进行了一百多年，直到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用“蒸汽磨”代替了“手推磨”，并在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应用的时候，资本主义才有了自己的物质基础。到了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封建势力再想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完全不可能了，资本主义制度才得到完全的巩固。马克思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什么，但肯定也有自己的物质基础，而且一定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基础。毛泽东于1957年，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必须有自己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463页。

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和目标。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计划没能实现，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导致1958年的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造成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于是，不得不进行几年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待到生产稍有好转，又开始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又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1976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开始搞改革开放，才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才有最近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今天，毛泽东讲的“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是否建成了呢？恐怕很难说，至少我们当今的生产力还没有资本主义发达，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高，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中，还对我们不利。因此，应该说，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还不是巩固的，我们必须作极大的努力，使我们的生产力得到更大的发展。当前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也是个极大的教训，搞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其生产力比我们要高得多，其物质基础要比我们巩固得多，但还是解体了，还是回去搞资本主义化了。这不是很值得深思的吗？这就说明社会主义还没有自己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基础，所以，它还是比较容易地被资本主义所战胜。社会主义制度要想巩固下来，必须建立自己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基础上。这个物质基础是什么？我们按马克思的思路推导下来：手推磨 蒸汽磨 智能磨。智能磨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正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产生出来，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以往的科学技术革命，是延伸人的四肢，扩大人的体力，应用在生产实践上，其最大成就，就是机械化的大生产。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比以往任何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要更深刻、更伟大，其不仅进一步延伸人的四肢、扩大人的体力，而更主要的是扩大人的脑力，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使智能化的生产代替机械化的生产，使生产力在更高层次上更快地得到发展。这种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这种智能化的生产力，早已从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并正在迅速地发展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好，就是因为社会主义能比资本主义更快更高地发展生产力；我们说资本主义制度不好，就是因为它阻碍并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要它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的存在是合理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要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它就迟早要被推翻，它的灭亡则是必然的。生产力越发展，就越是接近人类理想的更美好的社会。

我们目前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条标准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三条标准中最根本的一条是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综合国力才能增强，也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上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当然，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落脚点是人民生活，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也是社会主义之所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速度发展生产力的源泉和动力。

在这里，我想特别建议我们的干部，以及每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应

认真地读一读《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这本书里，邓小平同志对生产力的论述、对生产力的理解，真是无与伦比的，他把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同我们祖国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个真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真热爱我们这个祖国的人，都应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努力发展我国的生产力。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毛泽东是伟大的人民领袖，他对人民群众是英雄的观念感受最深，他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具有最深刻最全面的理解，并把这些观点贯彻于自己的行动之中，他教导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其整个革命生涯中处处谦虚谨慎，密切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成为最受人民群众信赖的伟大领袖。

人民群众是个历史范畴，毛泽东于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对人民下了个定义，他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我们现在也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现在的重点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毛泽东的逻辑推理之，凡是赞成、拥护和参加改革开放及经济建设的人都属人民之列。人民的主体是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人类社会历史主要地是由这些人创造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所以，毛泽东教育每一个干部“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把群众最大程度地组织起来，“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人民群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源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748页。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本第122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本第887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996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448页。

不可。”这就是人民战争的伟力。人民战争、人民的革命之所以一定要胜利，就因为它是“人民”的，有人民的参加，“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相反，一切反革命之所以一定要被打倒，一定被消灭，也正是由于它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以人民为敌，“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这些论断的正确性已经被中国的革命实践所证明，今后也必将被世界人民的革命所证明。

人民革命战争是社会历史大变动的一种状态，是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所采取的一种形式，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变质阶段。这个质变的完成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最大发挥，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突出表现。同样，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量变阶段，也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过程，没有人民群众日常的实践活动，就没有社会发展的量的积累，也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发展中的质变。

社会历史平常的发展，主要是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通过人民群众的活动，才使构成生产力的各要素在实践中联系起来，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使生产力得以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就要求改变生产关系，这就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到来。推动这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到来的是人民群众，完成这个社会大变革的力量也是人民群众。完成社会大变革就是新的社会形态代替了旧的社会形态，使生产力得到新的解放，社会又进入了新的和平发展时期，开始了新的更高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就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又会造成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又要求进行新的变革，再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天地，这就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所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当然，人民群众是个整体，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这个组成人民群众整体的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很不一样，他们的体力不一样、脑力不一样、所处的历史地位不一样、所拥有的社会物质财富不一样，如此等等，有的人强一些，有的人弱一些，有的人先进些，有的人落后些，有的人作用大些，有的人作用小些，毛泽东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更有一些特别突出的人物，站在人民群众的最前头，成为组织人民群众、带领人民群众前进的领袖。通过领袖的作用，把各个个人组成人民群众这个整体，使人民群众中的每一成员，各自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478—479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2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99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091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932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853 页。

都处在一定历史位置上发挥着各自所能发挥的作用。但实际上，只有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真正认识到群众和领袖的历史作用，教育自己的党员站在群众的前面，自觉地领导群众前进。历史上任何阶级、任何政党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都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都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都把自己当作救世主，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统治人民、压迫人民，违反历史发展规律，所以，最终都要或都将被历史所淘汰。毛泽东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他要求党的“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称这些人“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由于这些人的积极活动、努力工作，深入群众中去，同群众相结合，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积极的更加积极，使中间状态或落后的也积极起来，形成领导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强大革命力量，既从事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又从事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编织出人类光辉灿烂的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创立以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是不自觉地盲目地进行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思想而行动。至于自己的思想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是不是正确、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事先是不知道的，其结果，有的可能实现了预期的目的，有的部分地实现了，有的则完全没有实现。一般来说，完全达到预期目的是很少的，也就是说，谁也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最终结果是无数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正如小学语文课本上一篇课文及其一幅插画所揭示的那样：一辆装满货物的车子，一只虾在车子的前头使劲地往前拉，一只天鹅在车子的上方使劲地往天空拉，一条鱼在车子的下方使劲地往水里拉，它们各自都使足了劲向各自的方向用力，其结果只知道这辆车停在原地一动也没有动。为什么呢？四种作用力——加上车子及货物的重力——相互抵消了。这就是人类盲目地创造历史的实际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是缓慢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人们创造历史不是任意的，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受客观条件及其规律限制的，人们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合于客观所许可的条件，合于客观规律的要求，毛东教导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逐步地认识和掌握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就能比较地自觉了起来，或者逐步地自觉起来，人们愈是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就愈自觉。

人们获得这个自觉性是需要一定过程的，这个过程是人们不断总结自己实践经验的过程，也是不断接受教育、不断学习的过程。这就是说明，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创造历史的作用力尽可能同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尽可能避免那种与社会发展方向相违背的破坏力，从而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55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55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55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61 页。

减少各种力的相互抵消，这样，就会形成创造历史的伟大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更快了。

所谓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人们的思想，就是要教育人们很好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客观实际，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办事，老实地承认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受各种条件限制的，愈是承认这种限制、接受这种限制，就愈是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反之，愈不承认这种限制、愈想摆脱这种限制，就愈不会有什么自由。

首先是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代人，当他来到这个世上，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成员时，他必须接受前人给他创造好的或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也就是他必须面临着一种现成的生产力，任何人都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只能在历史提供的现成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活动，从事新的创造。同时，人们还必须接受现成的政治制度，受现成的政治制度及政治、法律观点等精神因素的制约。人们不仅在一定经济制度下生活，同时也在一定政治制度下生活。人们的活动不仅受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客观精神条件的制约。其次，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也受主观自身条件的限制。一个人的体力、智力及受教育等不一样，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从事创造历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也不一样。人们不仅要正确认识客观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同时还必须正确认识主观自身的实际条件，只有把自己主观自身的实际条件和客观所能提供的各种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有效地创造历史，才能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由此可见，人们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不仅受客观因素的制约，同时还受主观因素的制约；不仅受物质条件的制约，同时还受精神条件的制约；不仅受现成的活人的制约，同时还受历史的死人的制约。人们就是在这种种条件的制约下创造历史的，每个人都并不轻松，每个人都是为此艰难地创造着历史。区别只在于有些人对这些条件认识得正确些、深刻些，于是创造历史的活动自觉些、顺利些；反之，有些人对这些条件不认识，或认识不正确，他的创造历史的活动就处一种盲目状态，就不会有什么自由；有的人不管各种条件的限制而一意孤行，就只会碰得一败涂地，创造一幅惨败的历史。每个人都在创造历史——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同时，也就创造了人类社会历史——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当人们都能正确地认识客观及主观，并能自觉地运用这种正确的认识去从事活动的时候，就是人们自由地创造自己历史的时候。这时候的人，也就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同时，也必然成为自然的社会的主人。

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参与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但最基本的是人民群众。所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主要是指人民群众是促使社会发展的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

4、以群众利益为最高标准的价值观

价值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概念，是表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概念。其客体能满足主体的需要，该客体就有价值，越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其价值就越大。

既然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那么，很自然，人民群众也是价值的主体。凡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不然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讲，自然界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因为自然界提供

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自然界为人们提供衣食之源，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界要为人服务，为人类提供需要，这是自然界的价值。对于人类来说，人类能够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使自然界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这是人类自身的价值。然而，组成人这个“类”的，却又是很复杂的，其最基本的是人民群众。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基本力量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也是价值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创造了价值，是价值的主体，自然，人民群众也是评价价值的主体。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历史的主人，又是价值的创造者，有无价值或价值之大小，也只能由人民群众来评定，由人民群众说了算。不错，人民群众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都处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地位中，生活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环境中，都有各自的立场、观点，以及各自的不同利益，也就有各自不同的价值，但作为正确的价值观，必然是综合各个具体的人的价值观，必然是代表人民群众整体的价值观，离开了人民群众，或者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就失去了价值主体和评价价值主体的资格。

因此，价值标准当然是人民利益，愈是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就愈是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是一切共产党人说话办事的最高出发点，也应该是我们每个人说话做事的最高出发点。“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所以，人民利益是最高价值出发点，也是最高的价值标准。离开人民群众利益去谈价值，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观。

的确，人民不仅处在一定阶段、阶层，而且还分一定民族，处在一定地域，从事一定工作，可见各人的利益也就不一样。这就要求把个人及集体的利益同整个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统一起来，用正当手段为个人或集体谋取同人民群众相一致的利益。虽然这个利益只是被个人或小组获得，只要这个利益是同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相一致，至少不违背人民群众整体利益，这同样也是为人民谋利益。有许多事情，比如某个科学的发现，某项技术的发明，某一生产工艺的革新，都给个人或小组带来利益，同时又给整个人民群众带来利益，因为这些发现、发明、革新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对全体人民群众带来利益。再如有些工厂企业管理有方，新产品新市场的开发，为企业带来效益，有利于企业职工经济收入的提高，而其他企业、其他行业的职工并未直接受到该企业的利益，但只要它是真正使部分群众受益，随后就会影响其他部分的群众、带动其他部分的群众。这就是说，各地区、各单位的局部利益，尽管是局部的，但它是整体的局部，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只要局部不是损害整体利益，它就成为整体利益的一部分。一个局部的利益，影响其他局部的利益，各个局部利益组成整体利益，为局部谋利益也就是为整体谋利益。我们的事情，尽可能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由于地位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一般来说，是不能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997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995—996 页。

使所有的人民群众都得到利益，但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人民群众。雷锋做好事，直接得利的是被他帮助的对象，但是，雷锋为人民服务的这种精神、这种“出发点”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却不仅仅是被帮助的对象，而是整个社会、整个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并不反对为某个人或某个小集体谋利益，只要这个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是和人民群众整体利益是相一致的，并且手段是正当的，同样也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反对的是用不正当的手段、以损害人民群众整体的利益、去满足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了正确价值观的。

从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价值观出发，就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如什么书情都要依靠群众、尊重群众，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发动群众自觉自愿地去做，毛泽东教导说：“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要使群众“自觉和自愿”，就必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不能让群众自发或自流，“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要使群众觉悟，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努力为之奋斗，这是领导者的艺术，任何包办代替，或者跟群众后边随波逐流都是错误的，“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改，那是冒险主义，……当着群众要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一切机会主义都是脱离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这个价值和评价价值的主体，以自己的主观愿望作为标准，所以，不是从右的方面来指责群众，就是从左的方面来指责群众，因此，都必然要失败。

毛泽东的价值观和真理观是统一的。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一般来说，真理和价值并不都是统一的，真理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有利，即都有价值；反之，对一些人有价值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理。但是，作为人民群众整体，从人民群众主体这一高度，人民群众的活动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人心所向，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价值标准，就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相统一，因而，也就同真理相一致、相统一。凡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定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凡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一定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不存在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不相符合的状况。

要达到价值观和真理观的统一，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即毛泽东所说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913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213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214—1215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996 页。

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这种认识论应用于实际中，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种群众实践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又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的，所以，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

五、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上。在实践上，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向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顽强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人民中广泛传播，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上，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在政治上、经济上要同资产阶级斗，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不断地对无产阶级的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总结；另一方面，在思想上、理论上要同各种机会主义斗，各种机会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粉碎机会主义的进攻，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经济上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战胜了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社林等机会主义派别，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指导工人运动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去世后，特别到了恩格斯的晚年，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又企图复活起来，甚至改头换面地打着各种新招牌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攻，又曾遭恩格斯严厉地批驳。到了列宁时期，各种机会主义不但企图毁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基础，而且还疯狂地向革命的辩证法进攻，为此列宁写了许多有关文章，对各种机会主义逐一加以驳斥，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同样存在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哲学上，主要表现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还是坚持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斗争。但是，中国的机会主义，不管是“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它们都并不是在理论上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实行主观主义的指导。它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说，它们没有能力实行这种结合，不会应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因为几千年闭塞的封建统治，文化教育落后，理论水平低，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许多人不是因为接受了革命理论而起来革命，而是在反动派的压迫下没有了活路才被逼上革命的，这些人一旦掌握了一定权力，长官意志的主观主义就成了他们手里的武器，并能征服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人，使他们成为俘虏，成为推行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这种机会主义严重地阻碍对周围环境的了解，妨碍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在革命队伍内普遍地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扫除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实在是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毛泽东正是针对中国革命的这种情况，专门写了《实践论》、《矛盾论》，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要懂得认识的辩证法，要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只有运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周围环境，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才能作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和正确的工作指导，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并同时开展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终于克服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战胜了各种机会主义，使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得以在全党确立，成为我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并使革命取得了胜利。

实践上的胜利不能离开理论上的胜利，或者也可以说是理论上胜利的结果，同时又必然促使理论上的发展。

（一）毛泽东对唯物论的贡献。

哲学所研究的是世界上最一般的东西，哲学概念、范畴是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如物质、意识、运动、时间、空间、矛盾等等，要在这些极端抽象的概念上转圈子，把这些概念讲清楚，使之适合中国的文化，便于中国人民所接受，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毛泽东不在这些抽象概念上做文章，一则，这些抽象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已经有了很多很好的解释，再则，与其简单地重复这些抽象的理论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倒不如让这种抽象理论通俗地、民族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因此，毛泽东从实际效果、实际应用出发，把辩证唯物主义概括为“实事求是”，只要中国人民记住“实事求是”、理解“实事求是”、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这就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相一致了，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了。而“实事求是”确实是比较通俗，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并在实际上已经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传颂，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可以说，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普及和应用上，毛泽东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唯物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物质。“物质”是最高的抽象。人们所接触到的都是具体的东西。人们生活需要粮食。“粮食”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谁吃“粮食”呢？没有，你吃的是馒头、面包、米饭，面条……我们称之为粮食。除了粮食，还需要蔬菜，谁吃蔬菜呢？也没有，你吃的是菠菜、芹菜、小油菜、大白菜、胡萝卜……我们抛开它们各自的特点，把它们共同的东西抽出来，称之为“蔬菜”。人们不仅要吃，而且还要穿，你穿的是长袍、马褂、西装、中山装……我们统称为“衣服”。除了吃、穿，还要住、行，这都是人们生活所必须的。我们把这些生活上所必须的粮食、衣服以及住、行概括为“生活资料”，这是在“粮食”等抽象概念上的进一步抽象，毛泽东说谁见过人呢？没有，你见到的是张三、李四、一个个具体的人。“人”是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把张三、李四、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等等各个特点抛开，仅仅把“人”所共有的东西抽取出来称之为“人”。依此类推，对“生活资料”、“人”这些概念还可以再进行抽象，可以一直抽象下去，一直抽象到“物质”这个最高的概念，再也无法抽象下去了。“物质”是什么？物质仅仅是相对于人的感觉、思维而言，它是独立于人的感觉、思维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可见，“物质”这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一般是很难讲清楚，并让一般人所理解的。相比之下，毛泽东用“实事”来表达，就比较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了。“实事”是什么？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也就是说，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东西，它具有客观实在性，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一般把它当作物质理解，这是约定俗成，一种习惯的做法。

“实事”是同恩格斯的“实物”相一致的。恩格斯说：“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也就是说，“物质”这个概念是从各种具体实物中抽象出来的，“各种实物”则是具体的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可以为人们所感觉，但不为人们的感觉而存在，列宁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实事”、“实物”、“物质”都是客观实在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页。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卷第135页。

是“实事”、“实物”、“物质”引起人们的感觉，而不是感觉引起客观存在、产生物质，这就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线，坚持了唯物论的一元论。

毛泽东讲“实事”是可以找到它的“是”，而且都可以被人们所找到，“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认识“实事”，就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认识它的规律性。既然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能说出“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就表明客观事物是已经被认识，或者是可以被认识的，这就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问题，即思维与存在是有同一性的，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存在。可见，“实事求是”坚持了客观世界的可知性原理，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线。

毛泽东告诉我们这个“是”，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人们自己去“求”得的。“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就要求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照镜子式的机械的反映，最多只能获得“实事”的表面的“是”，而得不到“实事”的“内部联系”、“规律性”的“是”。可见，“实事求是”调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旧唯物论划清了界线，坚持了辩证唯物论，避免了机械唯物论。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包含了哲学基本问题，同唯心论、不可知论、旧唯物论划清了界线，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的一元论，其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实事求是”四个字，把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都统一了起来。这么丰富的内容，这么深奥的理论，用最简单、最明白的四个字就表达出来了，很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哲学就是实事求是哲学，也是中国人民的哲学，这是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邓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国人提出的改革派、还是保守派的时候，明确地宣布：“我是实事求是派”！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哲学。中国人民的哲学就是实事求是哲学。

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时代的哲学，都有自己民族的哲学。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产生了一批唯物主义哲学家，唯物主义哲学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19世纪，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寻求的是混乱的唯心主义哲学，正如恩格斯所说：“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遇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不正是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即自由派激烈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德国的哲学是一种使人“头脑混乱的哲学”，它的革命性是隐藏在教授们的“遇腐晦涩的言词”和“笨拙枯燥的语句”后边的，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这就是黑格尔哲学，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哲学。二十世纪，美国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哲学，有用即真理，这就是美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条 759 页。

《邓小平文选集》第 3 卷第 209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10—211 页

国统治者的哲学，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利而图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只对资产阶级有利，只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服务。

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哲学，中国人的哲学就是毛泽东哲学，亦即实事求是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毛泽东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新的阶段，创立实事求是哲学，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实事求是哲学变为党的思想路线，用到中国革命和其他一切工作上去，成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起的作用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因为有“实事求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事”相结合，“求”得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是”，走中国人自己的路：不是实行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积累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不是无产阶级主力军，而是农民阶级是主力军，同农民结成联盟，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不是一般地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分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既不消灭，而是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而是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如此等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方针政策都是“实事求是”的产物，都是“实事求是”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又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这也就是实事求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反之，一旦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然要失败。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实事求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还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68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68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1 页。

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党中央的决定则说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际都是一样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学习掌握“实事求是”这个精髓，这个灵魂。邓小平同志讲：“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当然，邓小平同志不仅读的书很多，而且亲自参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即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灵魂”理解得特别深刻，运用得特别熟练。全党同志都应以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使我们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是最实事求是的。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是黑格尔的追随者，但是，他们在追随黑格尔的过程中，发现黑格尔把自己的辩证法局限在狭小的唯心主义框框里，黑格尔创立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是要说自己的哲学体系是最完善的，是人类知识的顶峰，是观念发展的最高阶段。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而是他的观念发展的历史。反动的普鲁士君主制是他的观念的最高体现，是国家机构的最高理想，社会发展的历史到这里也不能再发展了。因此，他的观念辩证法一方面承认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在发展，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的观念在他的哲学里已经达到最高阶段，不能再发展了。这说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极不彻底的，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列宁说过，黑格尔仅仅在他的观念辩证法中天才地猜到了物的辩证法，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马、恩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和唯心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捍卫、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从而实事求是地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列宁也是最实事求是的，所以，列宁能根据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情况，实事求是地揭示了列宁时期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期的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得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国胜利论”的结论，并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列宁主义。

实事求是就是科学，或者说，科学就是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科学。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实事求是的产物，科学家要不实事求是，“地心说”可能今天还在统治着人们。任何科学都是实事求是的东西，爱因斯坦的实事求是，才创造了相对论理论；要是爱因斯坦不实事求是，大概至今还只有牛顿的经典力学而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科学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实事求是的结晶。真正的科学家，都是实事求是家。离开了实事求是既没有科学，也没有真正的科学家。

的确，实事求是是不容易的，而且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仅要付出体力和脑力的代价，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无论从科学发展史，还是从政治斗争史来看都是如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中国人依靠实事求是哲学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也将运用实事求是的哲学取得改革开放的胜利，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二）毛泽东对辩证法的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列宁的主要贡献在于明确了辩证法的核心是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曾作了些“说明和发挥”，他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实质”和“核心”是一个意思，一个是“对立面的统一”，一个是“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即一个是对立的统一，一个是统一的对立，也就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统一又对立，这就是矛盾，这就是世界。矛盾构成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切过程，并推动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和动力。“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这就是辩证法的世界观，与此相反的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因此，“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懂得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性，不懂得人类认识的辩证法，这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这些都是列宁对辩证法所作的主要贡献。但是，列宁还没有能对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进行深入的系统的“说明和发挥”。毛泽东就在列宁的基础上，对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入地“说明和发挥”，其集中表现在《矛盾论》这部著作中。

在矛盾普遍性问题上，马、恩分析了从简单的机械运动，到最高级的思维运动，都充满了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列宁指出从数学中、力学中、物理学中、化学中、社会科学中的一切领域都存在矛盾，矛盾是到处存在的。但都没有对矛盾普遍性这一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毛泽东则对矛盾的普遍性给以明确的含义，他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没有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并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必须把矛盾的差别性问题和矛盾的有无问题区别开来。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在矛盾特殊性问题上，马、恩、列都强调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不分析各别事物和各别运动的特殊性，就不能认识该事物和运动本身。毛泽东多次引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因此，毛泽东就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上，在理论上给具体化系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8 卷第 240 页。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 卷第 688 页。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 卷第 688—689 页。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 卷第 691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80、282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80、282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80、282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287 页。

统化，指出矛盾特殊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人的认识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外（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在矛盾特殊问题上还有一个矛盾的不平衡性问题，也就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次要的矛盾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都强调抓主要矛盾的重要性。列宁指出：“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还说：“我们军事上之所以取得了胜利，创造了奇迹，就是由于我们总是集中力量来解决主要的、基本的问题。”毛泽东的贡献不仅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且在实践上教导人们学会抓主要矛盾的艺术。所谓主要矛盾，是指“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矛盾。一般来说，事物都是由一个以上的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因此，要认识事物，必须分析其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分清其主次。“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同时，在任何一个矛盾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当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如果不研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不能把握事物的性质，也就找不出解决矛盾的正确办法。因此，“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92 页。

《毛泽东选集》版合订本第 283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85 页。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 卷第 526 页。

《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446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95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96—297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97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297 页。

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①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恩格斯说：“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它们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恩格斯指出：“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立之中。”^②列宁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也作了很多论述，他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③毛泽东则进一步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作了充分的论述，进一步阐发了列宁关于“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④为此，毛泽东对同一性给以了明确的含义，他说：“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⑤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讲的就是条件性，毛泽东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⑥所谓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反对、相互否定的这种性质或趋势。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因此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⑦从而推动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所以列宁讲：“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⑧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毛泽东运用这种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历史，分析中国社会实际，获得了对中国社会的切合实际的认识，制定了切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理论上，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把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4页。

④《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卷第689页。

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2页。

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1—302页。

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7页。

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7页。

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卷第689页。

定规律以及辩证法的诸对范畴，按其内在联系组织起来，成为辩证法的整体，创立了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矛盾论》的理论体系。比理论更重要的则是在实践上，也就是在具体运用上，毛泽东把辩证法运用在社会各个领域，创立了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辩证法、党的建设辩证法、经济建设辩证法等等。客观世界充满了辩证法的运动和发展，反映到主观上来，必须形成主观辩证法的运动和发展。世界就是这样一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史。

（三）毛泽东对认识论的贡献。

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特点，也是最大的缺点，关键都在于不了解实践，都把实践排除在认识论之外，因此，都是把认识作为一种机械的照镜子式的反映，马克思称之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论同以往任何唯物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实践，有了实践观点，才有能动的辩证的反映论，离开实践，既谈不上能动，也无什么辩证可言。所以，马克思把自己的唯物主义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特别强调实践。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则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并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当然，我们现代人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学习书本知识得来的，实际上也就是间接经验，“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问题，马恩都作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卷第149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59页—260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0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3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4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4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5页。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恩格斯说：“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尝试就必然要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了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末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毛泽东继承了马、恩的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又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的主要贡献在于实践上创导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种试验田”等一整套具体的发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方法，既尽可能地保证认识的正确来源，又尽可能地避免错误的认识对于实践的危害。

实践是认识的动力。认识随着实践的需要而发生，又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毛泽东说：“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深入，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认识的出发点，又是认识的归宿。认识从实践的需要出发，通过实践获得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用来指导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主要“在于改变世界”，“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从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来说，认识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认识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说：“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6—387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0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

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为理论而理论，或为认识而认识，这种理论或认识，不仅失去了目的，没有意义，而且失去了动力，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或认识。

为了更好地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对实践的形式作了全面的分析。马克思讲过实践是人的“感性的活动”、“客观的活动”等等，而未对实践活动的形式作深入的分析。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又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毛泽东在讲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说过：“实际性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

1963年，毛泽东在时《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时讲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实践形式分为三个层次：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实践；基本的实践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非基本的实践活动——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以及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其他活动。我们平常采用二分法，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种形式作为基本的实践活动，以及除此之外其他非基本的实践活动。基本的实践活动一般都提这三项，这是带上时代特色的。这三项的顺序，《实践论》的提法是科学的，无论从其产生的先后，或者还是从其所起作用的大小，第一位的应该是生产实践，这是毛泽东《实践论》里特别强调过的，因为有了生产活动，以及为了生产实践活动，所以才有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并且在提出实践形式的时候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所以把阶级斗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基本的实践活动。有了这两项实践活动，然后才有科学，才有真正的科学实践活动。科学实验活动是从这两项实践中派生出来的，也是为这两项实践活动服务的，特别是生产实践中派生出来的，是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毛泽东1963年的摆法，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看来是在强调阶级斗争了，因为在当时毛泽东的思想里阶级斗争很严重，阶级斗争比什么都重要，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9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59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0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

《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260页。

所以就把阶级斗争提到前边去，以示重视。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我们现在的提法还是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好，在顺序上还是应该把生产实践放在第一位。从当前及今后的发展趋势看，科学实验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不是一定要把它放在第一的位置上呢？看来现在还没有这种必要。

毛泽东对人的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论。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系统地阐明了认识的两次飞跃及其无限发展过程。

人的认识是个辩证发展过程，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毛泽东对这个“辩证的途径”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分析。“生动的直观”指的就是实践，是感性认识，是认识的起点，毛泽东说：“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性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感性认识“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理性的认识之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达到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因此，“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的辩证法。”要实现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一飞跃，一是“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二是“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但人的“思考”或思维过程必须符合思维规律，不然，材料再丰富也达不到目的的。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那么，获得了对于事物的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以后，认识是不是完成了呢？“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人们把对于客观过程的认识用来指导实践，如果达到了预期目的，证明认识是正确的，人们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算是完成了；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证明认识不正确，认识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证明认识不正确，认识运动没有完成。部分地达到了预期目的，证明部分的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5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7—268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3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7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7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9页。

确。“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客观过程是没有止境的，因此，人们的认识活动也是无止境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仍是无限发展的过程，一次比一次更深入，一次比一次再高级，永远没有止境。“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总之，认识从实践开始，又最终归结到实践，如果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突出贡献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科学地阐发了实践第一的观点。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71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72 页。

（四）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够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毛泽东正是按恩格斯这一教导去做的。正是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才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中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独创性的中国革命道路——前边已经说过了——不解决好道路问题，革命只是一句空话，今天也不一定会取得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理论的具体运用，也是适合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必其一攻于一役”的理论是不对的，它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运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心然失败的理论；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插上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也是不对的，这种理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截然割裂开来了，是要交出革命胜利果实的理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中国的革命必须是二者的结合，要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适当的时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必然要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既不是无产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新型的国家，形式上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既巩固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又有利于时机成熟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独特的创造性的，不是武装的流血的革命，而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改造，使中国社会自然地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使生产力遭到破坏，反而使生产力有所发展。凡此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的主要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以及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页。

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显然，这里用的“市民社会”是指社会经济领域，这个“市民社会”或者经济领域是“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及其含义是很明确了，但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概念还是用“市民社会”来表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明确地使用了“生产力”这个概念，他说：“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致，同时使工人陷于贫困并变为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愈发展，工人就愈贫困，工人愈不成为其人，而是成为物、成为机器。这是资本主义的悲哀。在这里马克思还表达了生产关系的概念，他说：“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同生产的关系。”又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这种“生产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是在私有财产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对立的关系，工人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就是要摧毁以私有财产关系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1845年3月，马克思在《评费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里更多地使用了“生产力”这一概念，他说：“生产力表现为一种无限高于交换价值的本质，”“生产力似乎是由我自己的本性中产生的目的，即目的本身……我以生产力的形式赢得的东西，是我的自我获得物。”并对生产力的具体含义进行了探讨，指出“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同时，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发展是对工人身体的摧残，是工人生产效率的降低，但说：“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又说：“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矛盾，必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激起工人的反抗，最终只有炸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桎梏，才能使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6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第26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61—26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63页。

力更快地发展。

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神至家族》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生产方式”这一概念，里边是这样说的：“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正象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指明“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的发源地”，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

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面论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了顺次转变的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成熟的标志。

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总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参与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树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物质生活底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

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明确地运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基本概念，并深刻地揭示了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构成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根源。但是，马克思一直没有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概念。列宁也没有运用这一概念。毛泽东则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这就更加表明人类社会是个有机整体，不管过去和现在，或者今天和将来，都有这个基本矛盾贯串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就是这种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及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表现的不同形态。这表明人类社会历史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是揭示社会有机体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规定这两对矛盾为社会基本矛盾，是因为它贯串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动力，它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其他矛盾，它规定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性质和面貌。不同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不同时期，社会状况是不一样的，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总是存在的，并且影响着其他矛盾，形成该社会的具体状况，推动着该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着向新社会形态的转变。

毛泽东研究了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及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但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的性质和状况不一样，因此，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情况是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就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这里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两个标准，一是“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一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应该承认，我们以往对此认识不深，重视不够，常常处于矛盾当中，一方面想抓生产，想迅速发展生产力，而一方面又总是接受各方面的干扰，甚至把工作中心都从发展生产、经济建设中转移掉了，直到1978年才真心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生产、经济建设上来，才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机会得以发挥。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但矛盾的性质却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有能力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和环节，调整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和环节，从而使生产关系不断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建筑不断地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保证生产力更快更高地发展。然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这种“调整”，确实实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不管生产力是否真正的需要，人为地去拔高生产关系，以为生产关系越先进越好。其实，生产关系先进不先进、优越不优越，是以生产力为标准的，凡适合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先进的、优越的，越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越先进、越优越。历史上任何一种生产关系当它刚建立起来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先进的、优越的，因此，都能较快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到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大大地落后于生产力，统治阶级不懂得必须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不断地适应生产力，或者即使做点调整，也只是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因此，终于使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比以往任何统治阶级都高明，就在于懂得社会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37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374页。169-IRO·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373页。

发展规律，懂得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从而保证生产力长期高速地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要。

社会基本矛盾反映在人际关系上，或者说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则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根据，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人际关系上的表现。因此，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在以往的社会里也都是存在的，即使没有阶级对抗的原始社会，各氏族、各部落内部的各种矛盾是非对抗的。而发生冲突的各氏族、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则不能不说是对抗的矛盾了，至于到了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自然是对抗性矛盾。而各级阶级内部的矛盾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概念，是毛泽东第一次提了出来，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了专门研究。

毛泽东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要搞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要搞清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这两个概念，毛泽东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容都是不一样的，都要作具体分析。“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则是根本利益相冲突的矛盾，所以是不可调和的。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所谓专政，就是“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因此，“专政的制度下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在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或称民主集中制，“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页。

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而我们确实是处理得当的，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转化的，“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反之，如前所述，对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处理得当，就转变成非对抗性的矛盾。可见，处理方法得当与否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进行，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为了更好地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邓小平同志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根据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严格遵循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这一原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一定成功。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